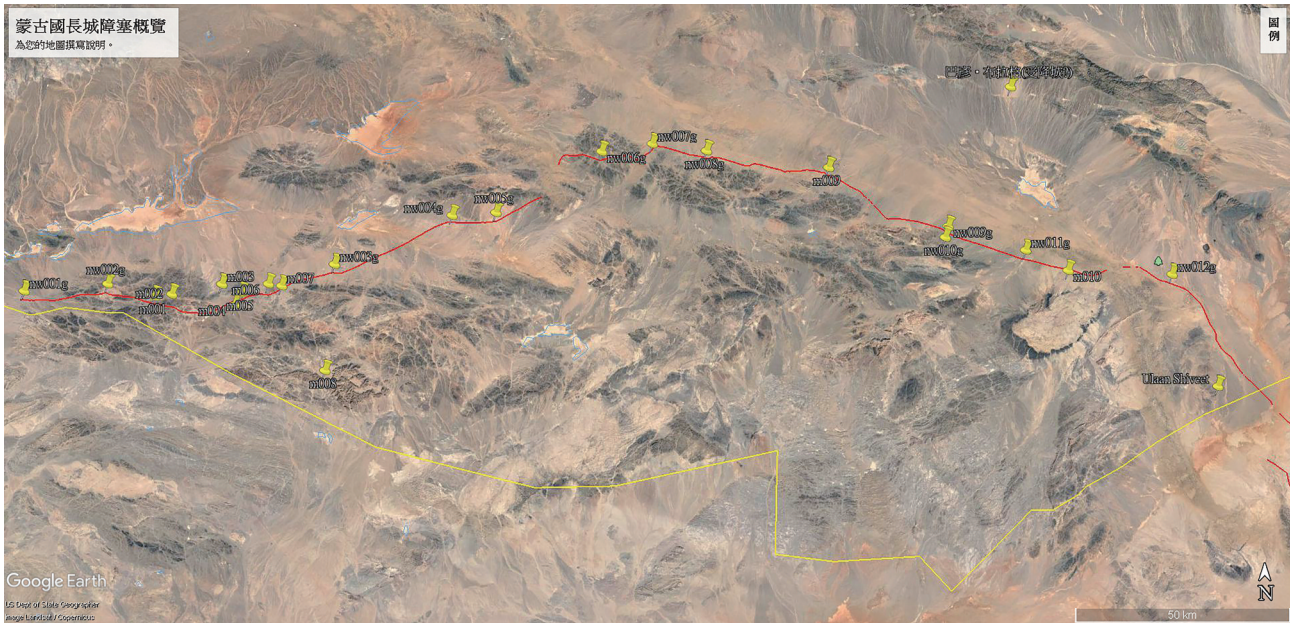
有待發掘的漢武帝「外長城」

—邊塞漢簡研究的未來—



蒙古國南戈壁省境內漢長城線及障塞遺址概覽

邢義田

中央研究院院士

古今論衡　第 34 期　2020.6

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以下簡稱《地圖集》）恐怕沒有人能否認是研究中國史最不可少的一套參考書。譚先生依據自己以及許多學者研究的成果，勾畫出歷朝歷代的行政疆域，指引參考者去掌握一個接一個王朝的政治空間。秦和兩漢的一冊更是研究的結晶，幫助大家認識秦漢帝國的規模和行政區劃。如果翻查《地圖集》西漢和東漢的北方邊界，一眼就可以發現兩漢和北方匈奴是以廣義的陰山和沿陰山修築的長城爲主要的界限（圖 1.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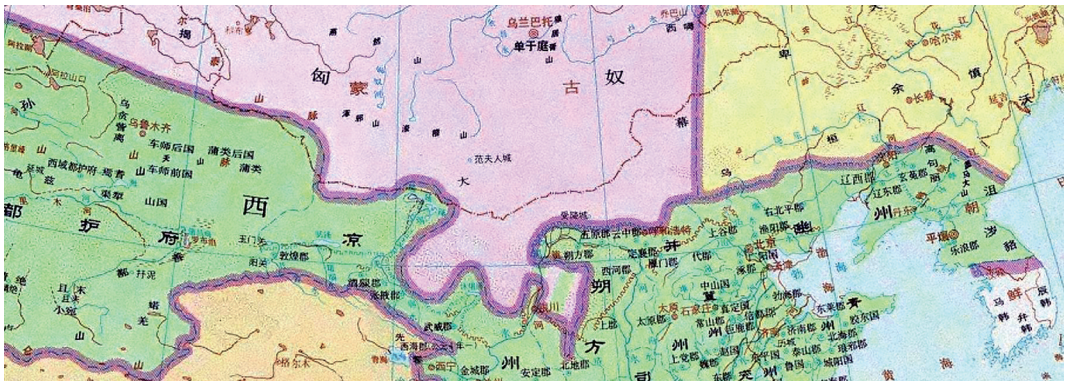


圖 1.1：《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第二冊，西漢時期全圖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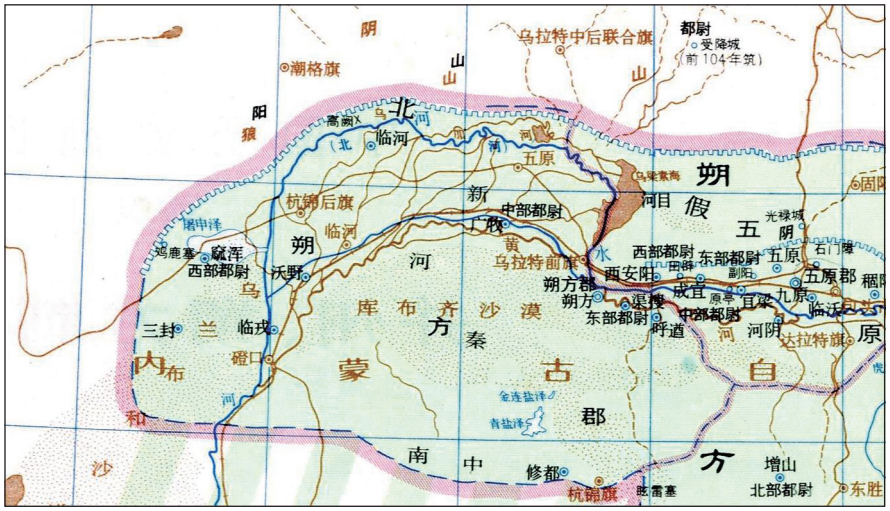


圖 1.2：《地圖集》第二冊，頁 33-34 局部

漢、匈奴以長城爲界是一般常識。漢初文帝在給匈奴單于的信中說得十分清楚：「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史記・匈奴傳》）。文帝說的長城在陰山南麓。秦始皇時蒙恬一度逐匈奴，渡「陰山北假中」，在陰山以北，陽山山脈築起一道長城。❶秦末亂起，戍卒離散，匈奴乘機重

＊ 未標示出處之圖片皆取自 Google Earth：https://www.google.com/intl/zh-TW/earth/，下同不一一說明。

❶ 關於蒙恬渡「陰山北假中」，在陰山北之陽山山脈修亭障長城，辛德勇先生有詳細研究。辛先生說「爲保障

奪陰山，佔河南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套地區，漢初僅能以陰山南麓的長城和匈奴爲界。❷可是稍查《漢書・匈奴傳》，即見漢武帝不但又奪回陰山河南地，更曾在蒙恬的陽山長城以北，建塞起隧，「築外城，設屯戍」：

> 漢元帝時，呼韓邪單于上書願保塞，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

這也就是說從秦始皇到漢武帝，秦漢帝國和匈奴之間的邊界拉鋸了好幾次，武帝一度將漢朝邊界遠遠推到陰山、陽山以北，築起新的塞徼、亭隧和外城。「外城」何指？又在什麼地方？王先謙《漢書補注》等書不見解釋，過去我也沒多留意。《地圖集》在陰山以北，曾標示出單于庭、受降城和范夫人城，沒有標注外城，也沒說外城是否即指受降城或范夫人城。《漢書・地理志》五原郡稒陽條注：「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虜城。」這五城也有可能即所謂的外城。但《地圖集》或本闕疑之義，沒有標示這五城的位置。一般人如果像我，參考《地圖集》時，常會疏忽那些沒標出的，除非刻意去找，否則就會忘了外城的存在。

一、過去的調查與爭議

拜近數十年來考古調查工作之賜，我們終於知道「外城」不僅僅是幾座可供戍守的障塞和亭隧，而是居於陰山和陽山以北，橫跨內外蒙古，由總長達上千公里，以土、石修築的城牆和一連串障塞亭隧構成的兩道長城。《漢書・地理志》所列五城可能僅是其中被文獻提到和較重要的幾座而已。換言之，漢、匈邊界自武帝太初三年（102 BC）以後到王莽始建國二年（10），長達百餘年不在陰山南北，而在陰山和陽山以北各約五十和一百公里的兩道長城。這兩道長城，今天中國學者多推定爲漢武帝所修，稱之爲外長城，以區別於一般常說的陰山或陽山長城。

在陰山北假中地區，安全地從事屯田或移民墾殖活動，不得不再修造一道防禦設施，將其護衛在邊境線之內。而要想達到這樣的目的，就需要把這一防禦設施，修築在陰山北假中地區北面的陽山山脈之上。」參辛德勇，〈陰山高闕與陽山高闕辨析〉，《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242。

❷ 關於漢初之漢匈邊界請參辛德勇，〈張家山漢簡所示漢初西北隅邊境解析〉，《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頁 256-263。

能認識到這些，是因爲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四至三十日我有緣參加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主辦的內蒙古遺址考察活動。考察因爲得到內蒙古博物館館長陳永志先生以及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張文平先生的協助，收穫特別豐富。活動結束後，在文研院成果檢討會上我曾報告自己一些粗淺的想法，席間承唐曉峰先生指教並賜贈大作。十二月底回臺灣後，才有時間閱讀唐先生早年調查內蒙古長城的報告以及內蒙考古所贈送的《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五巨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2018），初步認識戰國以及秦漢長城在內蒙的情況。

這套內蒙古長城資源調查報告的《阿拉善卷》包括額濟納河流域，使我不由得聯想到漢代的居延烽隧線和一九三〇、一九七三～七四年先後出土的簡牘文書。過去幾十年我花了一點心力學習居延、敦煌漢簡，退休後仍不能忘情於邊塞簡牘研究的未來。心中不免想問：一九三〇、一九七三～七四年僅在額濟納河流域的若干遺址即出土了數萬簡，一九九〇～一九九二年在敦煌懸泉置一個遺址出土三萬餘簡，這些地區如果繼續發掘，可能再出土多少漢簡？除了居延和敦煌，內外蒙古兩道外長城綿延上千公里，又可能蘊藏著多少簡牘？南北向的額濟納河烽隧邊防線和東西向的蒙古外長城可曾連成一氣，形成完整的防線？邊塞簡牘的研究將可能有怎樣的一個未來？

出於好奇，這一年多來我利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在跨越今日內外蒙古的兩道長城線上找到了數十處和額濟納河流域障塞規模類似，甚至更大的障塞遺址，如果系統發掘，或許可能有更多的簡牘出土。我先閱讀了唐曉峰先生的著作，唐先生曾在內蒙古長城線上調查多年並寫有調查報告，也一步步去讀了其他學者的論著。初步了解到大家對內外蒙古長城的修建、起訖、走向、時代以及遺址和文獻間的比定，都有不同的意見。蒙古、俄國和日本學者甚至認爲今蒙古國境內南戈壁省的長城延伸入內蒙，即中國學者所謂的長城北線，其實是成吉思汗邊牆或西夏長城。❸差別如此之大，究竟如何？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

❸ 關於內蒙古長城較早期的調查和發掘，較重要的見於一九八一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長城遺迹調查報告集》（以下簡稱《長城報告集》），其中尤以蓋山林和陸思賢一九七五、七六年在潮格旗朝魯庫倫調查和試掘命名爲朝魯庫倫石城和以東長城南線的障塞與本文最有關。參蓋山林、陸思賢，〈潮格旗朝魯庫倫漢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長城〉，《長城報告集》，頁 25-33。又一九九六至九七年李逸友先生曾調查中國境內的北方長城全線，發表了〈中國北方長城考述〉，《內蒙古文物考古》2001.1：1-33。文中對外長城南北線的起訖有進一步論述。承張文平先生告知，俄國和外蒙學者 A. A. 科瓦列夫、Д. 額爾德涅巴特爾曾於二〇〇八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第二期，頁 101-110 上發表〈蒙古國南戈壁省西夏長城與漢受降城有關問題的再探討〉公佈了二〇〇五和二〇〇七年兩國學者在蒙古國長城東西兩端所作調查並公佈了城址和亭隧遺址經緯度數據。二〇一五年權乾坤發表其所譯俄國學者 A. A. 科瓦列夫在蒙古國南戈壁省巴彥布拉格要塞遺址（漢受降城）的考古發掘成果，參 A. A. 科瓦列夫著，權乾坤譯，〈蒙古國南戈壁省巴彥布拉格要塞遺址（漢受降城）的考古發掘及西漢時期外部防禦相關問題研究〉，《草原文物》2015.2：91-99。按此文英文版較詳細，附圖較完整。參 Alexei A. Kovalev, Diimaazhav Erdenebaatar, Sergei S. Matrenin, Ivan Iu. Grebennikov, "The Shouxiangcheng Fortress of the Western Han Period-Excavations at Baian Bulag, Nomgon sum, Ömnögov' aimag, Mongolia," in Ursula Brosseder, Bryan K. Miller eds., *Xiongnu Archaeology: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the First Steppe Empire in Inner Asia* (Bonn: Vor-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 2011), pp. 475-508。此文指出蒙古國長城爲西夏長城。又承羅豐兄賜告 A. A. 科瓦列夫另有一文〈是否有可能漢河西長城被當作西夏塞牆使用〉，收入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絲綢之路上的考

稍查資料，注意到一個現象。目前已發表的內蒙古實地調查，包括前述內蒙古長城資源調查報告，僅限於記錄沿線各遺址地表所見或採集到的陶片等遺物，附有地表遺跡平面圖和遺址平面或航拍照片，地圖則僅標示漢武帝時所修兩道長城的大致走向，絕大部分沒有長城和障塞的經緯度數據。❹

漢世修長城本不分內外蒙古，今人要建立對蒙古長城及沿線障塞遺址的認識或進一步研究，第一步不能不先弄清南北兩道長城線的具體位置和長城沿線障塞修建的時代。也就是說先要掌握長城全線及障塞的經緯度，經過實地踏查、採集或發掘遺物，才能解決外長城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基本問題。據張文平先生告知，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內蒙古自治區漢代外長城、秦漢陰山、陽山長城和灰騰梁長城曾經全面實地調查，正在整理資料，幾年內將可陸續出版。❺即將公佈的資料應該遠比過去報導的全面和確實，但從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這整套書共同的出版體例可知，很可能不會提供內蒙古外長城遺址的經緯度，也不會「越界」納入蒙古國境內的長城。❻

利用谷歌地球，我得到內外蒙古長城全線障塞的經緯度數據，數據或許不夠精確，也不免有遺漏或失誤，但樂於公佈。因爲內外蒙古的長城遺跡雖已調查，絕大部分迄今未曾發掘，絕大部分經緯度數據，尤其是內蒙的，未曾公佈。本文提供的數據對中外的長城研究者和今後的考古發掘或許可以有些幫助。

報告數據之先，想再多說幾句中外學者不同的看法。關於蒙古國境內的長城，一九七五和七六年曾實地考察內蒙長城的蓋山林和陸思賢先生即指出，內蒙南北兩道長城和武帝時光祿勳徐自爲修築的障塞列亭有關，「這兩條長城，在今潮格旗西北部，都進入了蒙古境內。據當地牧民說，北面的那條長城，一直到了阿爾泰山脈中。南面的那條長城，據內蒙古文物隊一九六二年、六三年在額濟納旗調查所知，和居延塞外的長城障塞遺跡可以聯繫在一起。」❼一九九六至九七年曾調查內蒙長城的李逸友先生也說「居延塞之東北端與外城南線相接也非虛構。」❽換言之，他們都據牧民之說，認爲蒙古國的長城是內蒙長城南線的延伸。蓋、陸二位的調查報告附有一張朝魯

古、宗教與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 146-157。謹謝。日本學者靭山明、森谷一樹在通信或論文中也都傾向於認爲是西夏長城。

❹ 目前內蒙古長城及障塞遺址經緯度僅見魏堅主編的《陰山滄桑：烏拉特後旗歷史文化遺存調查報告》（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一書公佈了屬烏拉特後旗遺址的少數數據，參頁 70-83。本書承森谷一樹先生告知，謹謝。

❺ 關於灰騰梁長城目前有張文平、袁永明主編，《輝騰錫勒草原訪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一書可參。

❻ 這套書已出版的各省和各自治區分冊絕大多數沒有提供遺址經緯度數據，僅吉林省一冊附有漢代烽隧遺址經緯度。參吉林省文物局編著，《吉林省長城資源調查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頁 7-10。但此書其它部分遺址又完全不附，可見編輯體例並沒有要求必須附經緯度。內蒙古調查報告已出版六卷七冊，皆無經緯度。

❼ 見前引蓋山林、陸思賢，〈潮格旗朝魯庫倫漢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長城〉，頁 32。

❽ 李逸友，〈中國北方長城考述〉，頁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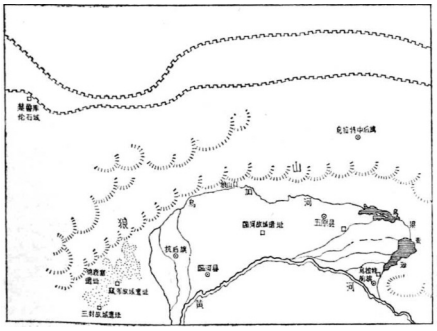


圖 2：蓋山林、陸思賢，〈潮格旗朝魯庫倫漢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長城〉，圖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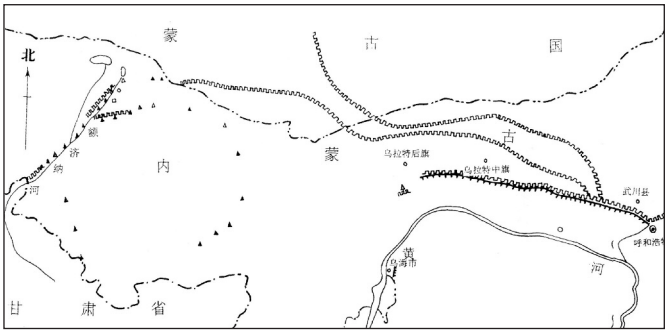


圖 3：李逸友，〈中國北方長城考述〉，圖二局部

庫倫北部兩道漢代長城的示意圖，不過這幅圖僅僅繪出了陰山以北兩道長城線的一部分，並沒有顯示出長城東西的兩端（圖 2）。李先生的附圖則較明顯示意南線和居延塞的關係（圖 3）。

較早較完整的內外蒙古外長城全圖見於唐曉峰先生一九七七年發表的論文。唐先生據某一大比例尺地圖，繪製了全線示意圖。圖中北線長城深入今天蒙古國南戈壁省，南線由內蒙伸入外蒙邊界不遠而止（圖 4）。唐先生可以說間接糾正了蓋、陸、李三位以爲南線長城和額濟納居延障塞可以聯繫的說法；如果可以聯繫，應該是北線長城。一九八七年甌燕先生發表〈我國早期的長城〉，文中附有東周秦漢長城位置示意圖，示意外長城北線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但將長城南線畫到內外蒙邊界爲止（圖 5）。❾ 其他中國學者多半受蓋、陸、李三氏影響，以爲南線進入了蒙古國之境（圖 6）。❿

二〇〇五、二〇〇七年蒙古國和俄國學者曾兩度合作調查外蒙古長城東西兩端部分的城段，證實北線長城的確深入蒙古南戈壁省，北線長城西端和居延烽隧線北端的殄北塞（A1）直線距離僅約一百公里；南線從谷歌地球上看，並沒有進入蒙古國邊境。⓫ 但據二〇一一～二〇一二年日本和蒙古學者在中蒙邊界附近的調查，南線似乎如唐曉峰

❾ 甌燕，〈我國早期的長城〉，《北方文物》1987.2：13。

❿《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秦漢長城遺址條（頁 375-377）和《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秦漢長城遺跡分佈圖都受到蓋山林、陸思賢、李逸友的影響，以爲南線外長城進入蒙古，並和居延邊塞相連。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187-190 認爲長城北線進入蒙古國約五十餘公里，止於巴彥達賴附近的尚德山，即傳世文獻中說的盧朐。又認爲南線長城是否與居延相連尚乏可信的證據，但說長城南線進入了蒙古國南戈壁省，西端至朝魯庫倫。其說及所附漢代外長城圖（頁 189）現在看來明顯有誤。徐蘋芳先生在談到居延塞時，明確說居延塞「其北端與光祿塞南面一條長城相接」。參徐蘋芳，〈考古學上所見的秦漢長城遺迹〉，原載《探古求原——考古雜誌社成立十周年紀念學術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後收入徐蘋芳，《中國歷史考古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95。徐龍國在其《秦漢城邑考古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 194 說武帝修的外長城南線「至烏拉特後旗西北部伸入蒙古國境內，再西行與居延塞相接」。可見蓋、陸、李三氏的說法對中國考古界影響之大。

⓫ 魏堅據實地調查，指出南線沒有進入蒙古國境內，參其主編的《陰山滄桑》頁 71。最新的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文物局）、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阿拉善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 179 也接受了南線沒有進入蒙古國境的觀點，但不同意蒙、俄學者其它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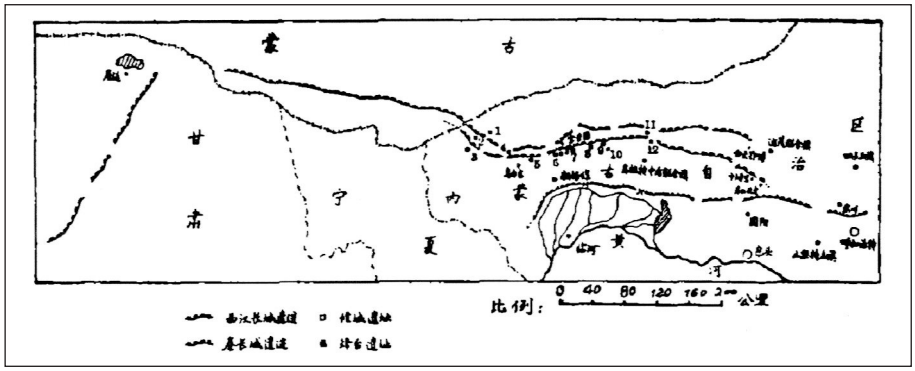


圖 4：唐曉峰，〈內蒙古西北部秦漢長城調查記〉，《文物》1977.5，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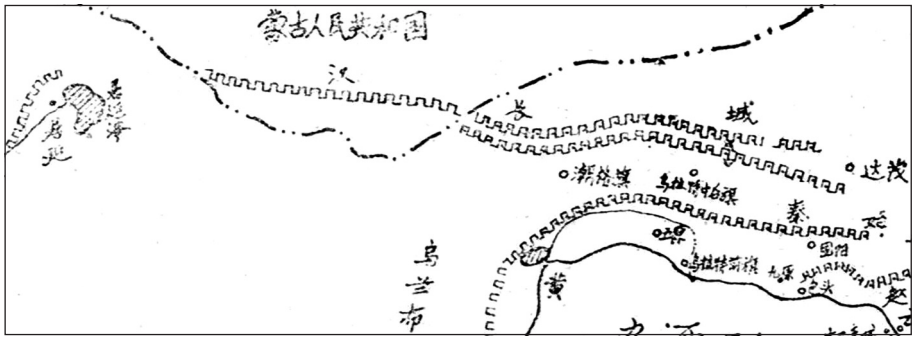


圖 5：顧燕，〈我國早期的長城〉，頁 13 附圖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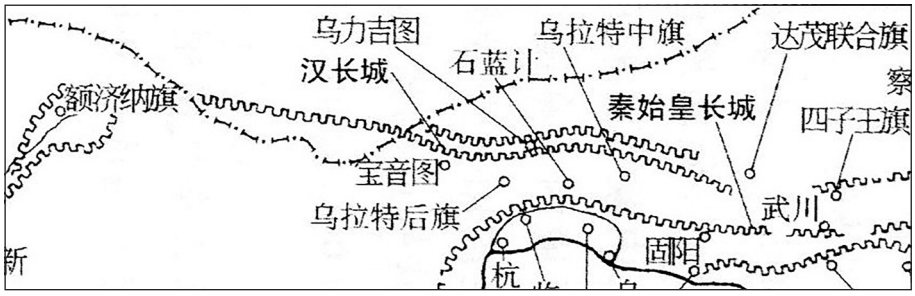


圖 6：《中國考古學・秦漢卷》，長城地圖局部

所說有一小段曾進入蒙古國境（詳見後文）。⓬ 遺憾的是蓋山林、陸思賢和唐曉峰爲時代環境所限，都沒有機會進入蒙古國作實地調查。

二〇〇八年，俄國學者 A. A. 科瓦列夫和蒙古學者 Л. 額爾德涅巴特爾在《內蒙古文物考古》第二期發表〈蒙古國南戈壁省西夏長城與漢受降城有關問題的再探討〉一文。文中公佈了十三處障塞和亭隧遺址的經緯度數據，並以經緯度說明長城全線大致

⓬ 森谷一樹、白石典之、D. Odsuren、Ts. Buyanhishig、G. Batbold、相馬秀廣，〈2011-2012 年蒙古國南戈壁省長城、城堡遺址調查報告〉，收入魏堅、呂學明主編，《東北亞古代聚落與城市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頁 75-80。此文多承森谷一樹先生示下，謹誌謝忱。

所在的位置。他們更從長城牆體建材中取得的梭梭等標本，作了碳十四年代測定，⓭並據測年所得和遺址中採集的西夏文物，否定了漢代外長城南線由內蒙延伸入外蒙境內的看法。

他們認爲蒙古南戈壁省的長城實爲十三世紀的西夏長城，蒙古國一般人更習慣稱之爲成吉思汗長城、成吉思汗邊牆或征邊牆。二〇一一年 A. A. 科瓦列夫又發表〈是否有可能漢河西長城被當作西夏塞牆使用〉一文，⓮據俄譯一一六九年編的西夏律令《天盛改舊新定律》，⓯進一步認爲一般中國學者所說用蘆葦和紅柳築成的漢代河西長城（即大致沿疏勒河一線的長城）其實有可能被西夏加固利用作爲塞牆。換言之，在他看來整個內外蒙古所謂的北線外長城和河西長城都是西夏爲抵抗蒙古而修築或加固過的長城（圖 7）。內蒙的外長城南線才是漢世文獻中所謂的光祿塞，而南線到中蒙邊界而止，沒有進入蒙古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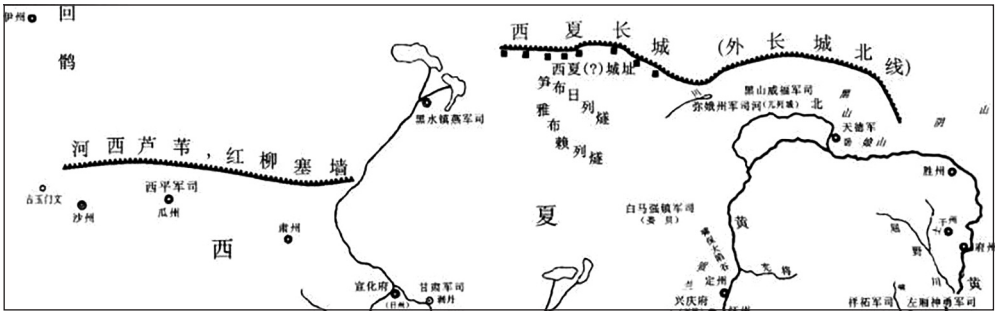


圖 7：A. A. 科瓦列夫，〈是否有可能漢河西長城被當作西夏塞牆使用〉，圖一局部

二〇〇七、二〇〇九年人民大學魏堅先生曾兩度率隊在內蒙烏拉特後旗調查地區內的長城與長城內側的十幾座古城，從長城分佈、走向和具體構築方式判斷，認爲武帝所修「光祿塞的列塞除少量古城可能爲光祿塞上的邊城，並多數在西夏時期經增築沿用外」，「有八座古城很可能爲西夏人修築西夏長城時增築的屯兵邊城。」⓰

二〇一一年，英國的長城愛好者威廉・林賽（William Lindesay）曾利用谷歌地球並在蒙古國實地調查了一百公里的長城城牆，又將取得的梭梭樣本送到英國作碳十四年代測定，結果屬十一、二世紀。可是林賽認爲，長城本體應修於西元前一二〇年左右，因爲城牆結構和建築方式和他在內蒙古看見的漢代長城相似，後來西夏曾經加固和利用罷了。⓱

⓭ A. A. 科瓦列夫沒有說明碳十四測定取樣的方式和程序，鑑定結果是否可靠猶待進一步驗證。詳見下文。

⓮ A. A. 科瓦列夫，〈是否有可能漢河西長城被當作西夏塞牆使用〉，頁 146-157。按此文引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若干關於蘆葦捆束的規定和功用，發現和河西長城築城材料相合，以證河西長城乃西夏所修。他對所引證據有誤解。西夏曾用蘆葦等加固漢城尚可一說，但由西夏所修，須要更堅強的證據。

⓯ 史金波等人的中文譯注本名爲《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⓰ 魏堅主編，《陰山滄桑》，頁 19, 116。

⓱ 參威廉・林賽著，經雷譯，〈走失的長城：在蒙古國尋找中國長城〉，原刊《華夏地理》2012.3，轉見國家地

二〇一一～二〇一二年日本學者森谷一樹、白石典之、相馬秀廣和三位蒙古學者 D. Odsuren、Ts. Buyanhishig、G. Batbold 一起調查了 A. A. 科瓦列夫等沒有調查的蒙古國其它長城和障塞，共同發表〈2011-2012 年蒙古國南戈壁省長城、城堡遺址調查報告〉（以下簡稱〈森谷報告〉）。⓲〈森谷報告〉公佈了一件碳十四測定數據，一處名爲無名城堡②城壁的年代是 1047-1166 年，也就是屬西夏時期。深感慚愧，我在寫本文前一直不知這一調查報告的存在。本文初稿寫好後，呈請森谷一樹先生指教。他在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的電郵回信中附示了他們的調查報告。如果早一點知道日、蒙、俄學者的論文附有蒙古國障塞遺址的經緯度，必可省去我不少在谷歌地球上大海撈針的力氣。不論如何，以下仍舊先稍稍一述我獨立追索的經過，再進一步說明「遙觀」所獲和日、蒙、俄學者實地調查成果的異同。

二、利用谷歌地球尋找蒙古國境內長城及障塞

利用谷歌地球追索之初，眞的像大海撈針。蒙古國南戈壁省長城所經之處，幾乎全爲荒漠戈壁，沒有經緯度的憑藉，要找長城，就像掉進了沒邊沒岸的茫茫大海。

二〇一八年秋於內蒙考察時，人民大學考古學家劉未教授用手機分享給大家他利用有經緯度的外國地圖，標示出內蒙地區漢武帝所修外長城的長城線（圖 8）。檔不大，僅能在手機上看，稍放大即不清，經緯度數據無法判讀。儘管如此，地圖上兩條標示外長城的曲折紅線已經是我當時能找到最準確的一點線索了。唐曉峰先生一九七七年發表的論文僅有極簡單的示意圖，《中國文物地圖集》和《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圖 9-10）附圖都沒提供經緯度，依據這些圖在谷歌地球上找長城或障塞，就像瞎子摸黑，事倍而功半。

於是我假設邊防線應爲線狀，二〇一九年初試著從明確已知的遺址出發，向周邊盲目地尋找地表可能的線狀線索。因爲對居延地區的遺址知道較多，也較明確知道居延邊塞最北屬於殄北候官所轄，研究者幾乎共同認定殄北候官治所位於殄北塞或部（A1）。⓳殄北塞遺址（圖 11）就成了我追索的出發點。

殄北塞曾出土漢簡五、六十枚，包括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建武之世的紀年簡。由此向西北，另有編號 K676 和疑爲 K677 的兩障址。二〇〇一年德國學者紀安諾

理中文網（2015.11.24），鳳凰藝術網轉貼 http://art.ifeng.com/2015/1124/2616972.shtml（2019.05.24 檢索），又參威廉・林賽另一文〈我用碳 14 測年法確認「成吉思汗邊牆」修建年代，測試結果讓我又驚又喜〉，見 https://www.360kuai.com/pc/9b06f6e9cbc3ed83e?cota=3&kuai_so=1&sign=360_7bc3b157（2020.02.10 檢索）。

⓲ 見前注 12。

⓳ 自陳夢家先生和《居延漢簡甲乙編》推定 A1 爲殄北候官治所以後，學者雖間有異議，多數學者仍較接受此說。前引《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阿拉善卷》，頁 90 也同意 A1 爲殄北候官治所。其它不細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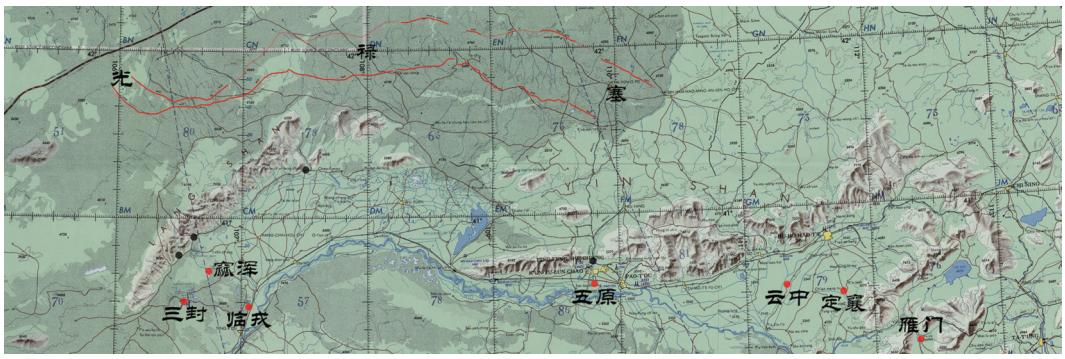


圖 8：內蒙古外長城（劉未教授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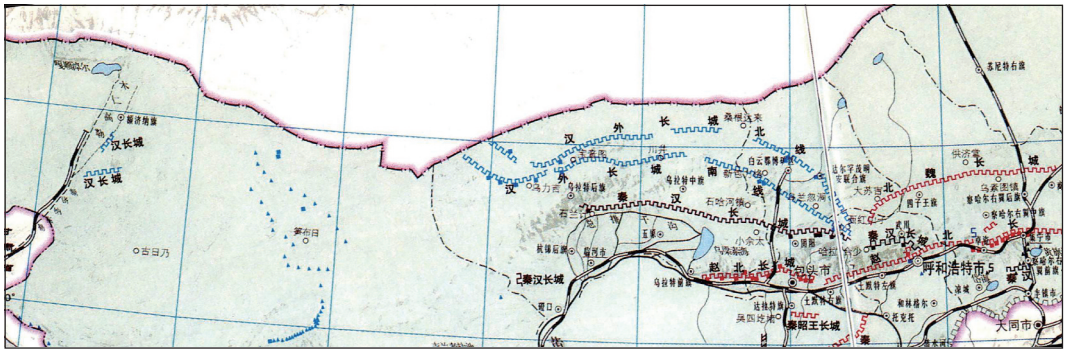


圖 9：《中國文物地圖集・內蒙古自治區分冊》（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3），圖 64-65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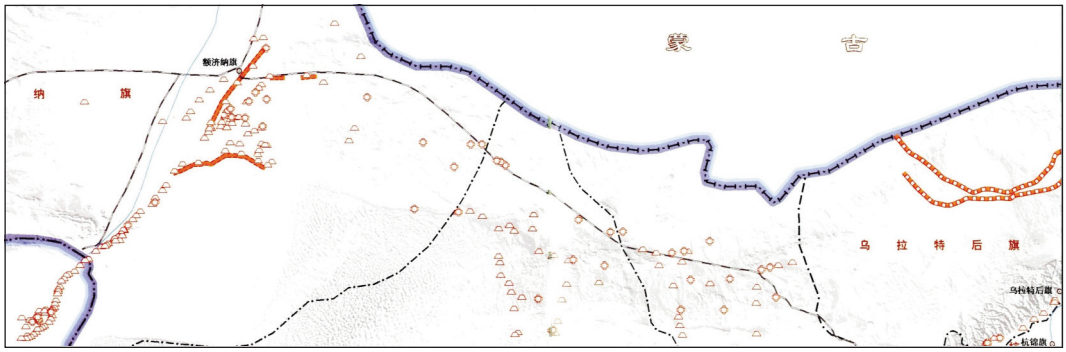


圖 10：《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阿拉善卷》，阿拉善盟長城總分佈圖局部



圖 11：殄北塞（A1）遺址西壁（2006 年張俊民攝，北緯 42° 09’06.45”　東經 101° 14’04.67”）

（Enno Giele）曾去考察，取得經緯度數據。[20] 我根據其數據，試著在谷歌地球上標定這些障塞，可惜無法明確辨識地點。《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阿拉善卷》附圖曾標明在殄北塞北和東北方各約 40 至 60 公里，最少另有三處居於內外蒙邊界附近的烽隧遺址（內蒙公社敖包的查干松治烽隧、賽罕陶來的哈日川吉烽隧和外蒙某地的烏蘭松治烽隧）。我利用谷歌地球上的當代地名，仔細搜索周邊，可惜也無法找到任何障塞的蹤影並具體定位（圖 1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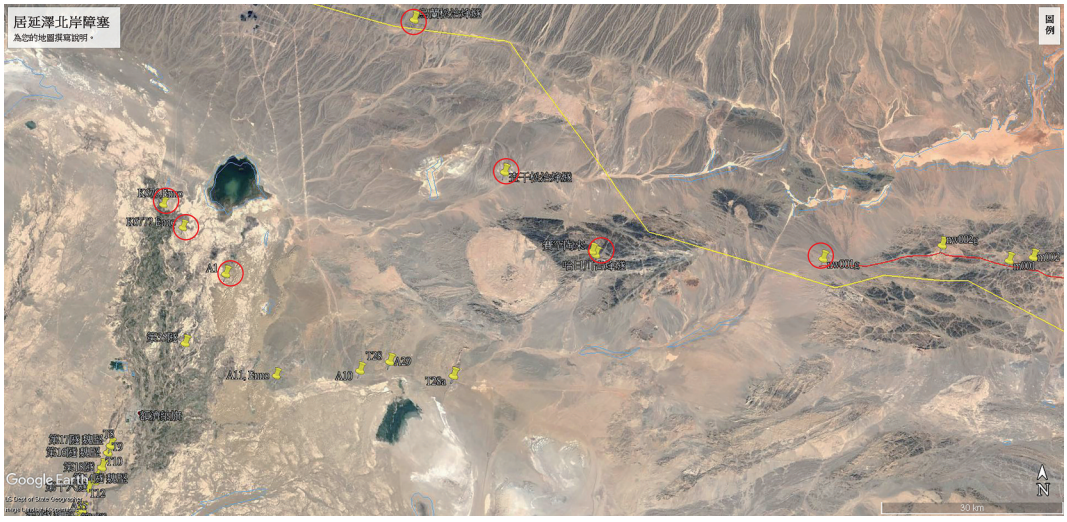


圖 12：殄北塞 A1 和 K676、K677?、查干松治、哈日川吉、烏蘭松治烽隧、nw001g 相對位置

爲尋找更多線索，我又試著上網尋找網友遊歷內蒙長城的遊記和照片。居然有極少數人附記了所見遺址的經緯度。此外，也利用谷歌地球上的旅遊照片，或從谷歌地球標出的當代地名（例如東邊牆，西邊牆或邊牆壕村……）（圖 13）估計長城存在的約略位置，縮小搜尋的範圍。這樣搜索了幾星期，收獲很小，大失所望。

二〇一九年三月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某日在酒店中無聊，順手將電腦游標隨意由殄北塞滑向蒙古國，竟然在殄北塞正東直線距離約 100 公里，意外發現了一道明顯的人爲線狀遺存。起初並不確知這是什麼，繼而在遺存南方約 100 公尺處，看見一座幾乎正方形的建築，建築一角以幾乎 45 度角正對線狀遺存，像吊掛在長線下菱形的鑽石。由此覺悟線狀人爲遺存應是一道長城！興奮之餘，立即以大頭釘釘上，將建築命名爲「障址 1」（圖 14.1-14.2）（目前已修改編號爲 nw001g，nw 爲 northern wall，g 爲 garrison 縮寫）。這一發現猶如找到了線團的線頭，由障址 1 或 nw001g 向東順藤摸瓜，沿著十分清晰的城牆線釘大頭釘，不少南北向的河川沖毀了東西向的長城，造成

[20] 這些數據見邢義田，〈全球定位系統（GPS）、3D衛星影像導覽系統（Google Earth）與古代邊塞遺址研究〉，《地不愛寶》（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238。

[21] 這三處遺址被歸入額濟納旗西夏長城部分，詳細記述見前引《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阿拉善卷》，頁 155。但從所述烽隧形制，一時無法判定其時代。



圖 13：包頭市東北，趙北長城附近有東邊牆壕、西邊牆壕的村鎮地名。圖中紅線為作者所加，下同



圖 14.1：nw001g 障塞遺址及北側長城線



圖 14.2：nw001g 原編號障址 1

牆體斷斷續續，但多數牆段仍十分清晰可辨。沿線一座座外形類似的障塞陸續出現，大頭釘隨即越過外蒙和內蒙的邊界，進入內蒙直到今固陽東北，在一片高度開發的田野和密集的道路、村鎮聚落中才失去了長城的線索（圖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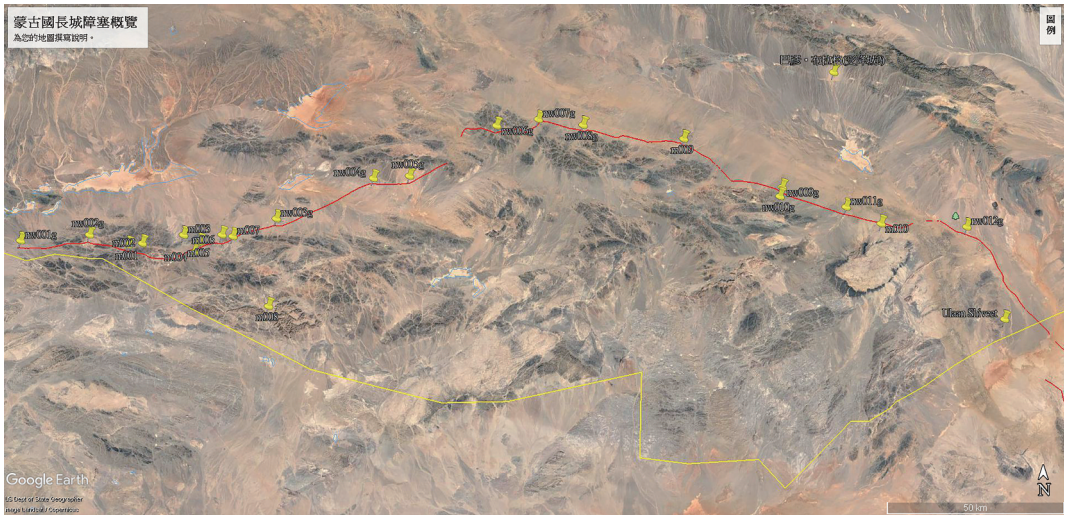


圖 15：蒙古國境內漢長城線及障塞遺址概覽
圖中紅色為長城線，黃色為內外蒙邊界線，大頭釘為障塞亭隧遺址

有一點必須先聲明。二〇一八年年底我自北京回臺北，二〇一九年年初開始利用谷歌地球尋找內外蒙古長城及障塞遺址，直到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承蒙張文平先生示知外蒙和俄國學者的論文。論文中有三處城址地點和我找到的相同，但我遺漏了蒙、俄學者稱之爲亭障或烽隧的六處遺址。這些遺址很小，位於長城線南北兩側山頭，谷歌地球上較難分辨。幸運的是我另外找到七處城址（另有兩處疑似城址）不見於他們的論文。[22]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得見森谷一樹先生等發表的調查報告，才知他們調查的障塞和我「遙觀」的竟然大部分一致，可以證明谷歌地球「遙觀」也有一定的準確性。但比對以後，發現我遺漏了兩處遺址，另有三處或許可補他們的不足。

谷歌地球雖爲利器，局限性十分明顯。目前的谷歌地球是由無數局部的衛星照片拼綴而成，過去十餘年來不斷更新，絕大部分地區的影像趨於清晰，無奈有些區域仍然欠佳，甚至出現因照片解析度不同，拉近以後的影像清與不清，涇渭分明。以內蒙而言，大部分地區已相當清晰，足以見到公路上的車輛，甚至樹木，但我企圖追索的長城線，仍有不少地段，一旦拉近即一片模糊（圖 16.1-16.2）。因此，目前所能見到的長城線，有些斷裂和缺環不是因爲長城遺跡不存在，而是谷歌地球這一工具本身有局限。這是必須先聲明的。

[22] 請參後文並參本文附錄表二「蒙古國南戈壁省長城障塞亭隧遺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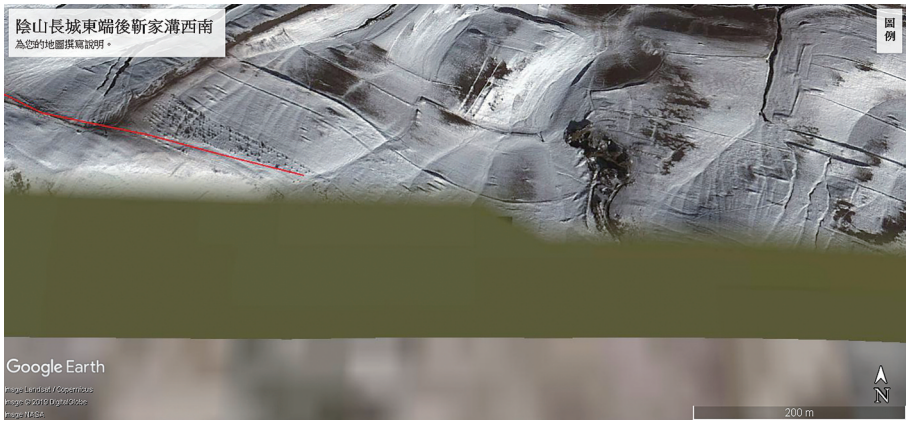


圖 16.1：谷歌地球 2012 年影像：陰山長城東端，後靳家溝西南 41°05’25.21” 110°35’2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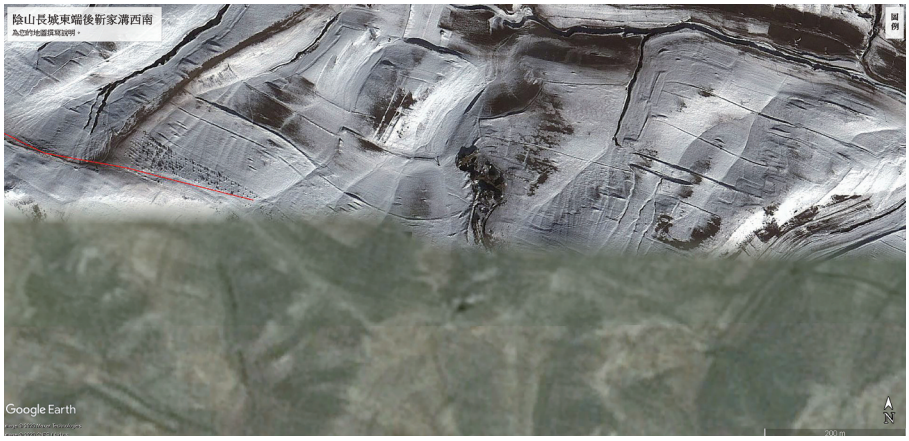


圖 16.2：後靳家溝西南同一地點 2019 年影像

其次，從谷歌地球遙觀，如何判斷是長城的牆體，而不是近代道路或其他性質的線狀人爲痕跡呢？最關鍵的一個辨識方法就是如果沿線隔一段距離即出現一個約略方形，大小可分若干等級的建築遺跡，即可確定是長城線無疑。參照已知的邊塞遺址形制（例如居延、敦煌），可以知道漢代修障塞或長城有一定的規格，雖也常常斟酌實際地形和防衛需要而調整，其規律性仍然大致可循。

近代公路或車輛在戈壁灘上留下的車轍，在谷歌地球上清晰可辨。有些古代道路即沿長城而修，今天仍舊沿用，古今道路和長城因此有不少重疊或交叉。但今天的道路多取直線，寬窄和長城遺痕明顯不同。古代長城不論土築或石砌，必須配合地形和防衛形勢，往往不一定修成直線，其遺痕寬窄和曲度不像近代道路那麼一致，因此在大部分情況下，稍有觀察經驗，並不難區別近代道路或其他線狀痕跡（例如鐵路、公路、分界柵欄、村莊邊牆、田壟、車轍……）。

當然，如今可見的長城線及障塞保存情況不一，有些頗佳，有些殘斷，有些經後世改造利用，形狀改變或不完整，更有很多已湮沒無痕。如此，儘管谷歌地球提供的

影像夠清晰，有些長城和障塞烽隧仍然無法辨識出來；沒有經過實地踏察，說實在，不能令人完全心安。這也是應該聲明在先的。

第三點必須聲明的是利用谷歌地球，比較能夠看清障塞亭隧遺址的外形和大小，比較難以分辨長城牆體的材質和如高度等之殘存狀況。受到工具上的限制，以下所談將以障塞遺址爲主，長城牆體僅能稍稍觸及。

三、蒙古國南戈壁省的長城與障塞——兼論漢與北魏長城障塞形制之異

蒙古國南戈壁省這道長城綿延約 300 公里，障塞周邊幾乎全是山脈、沙漠或礫石戈壁，不少城段和障塞已被內陸河流沖毀而消失，但是仍然有極長的城牆斷續不絕。牆體高度從谷歌地球上無法估計，但從影像看，通常土築牆的中央較高，向南北兩側傾塌，傾塌面寬度在 2、3 至 8、9 公尺左右（圖 17-18）。據蒙、俄學者和威廉・林賽報導，用土和梭梭（haloxylon ammodendron）築成的牆體高者可達 2.5 公尺（圖 19），山區石砌者更可高達 3 公尺（圖 20）。



圖 17：nw003g-004g 障塞間長城線遺存寬度約 8 至 9 公尺



圖 18：威廉・林賽（William Lindesay）考察照片，可見土築牆體向兩側傾塌情況（拍攝地點不明）



圖 19：由土和梭梭構築的牆體高達 2.5 公尺



圖 20：蒙古國石砌長城（拍攝地點不明）

圖 18-19 引自：威廉・林賽，〈走失的長城：在蒙古國尋找中國長城〉
圖 20 引自：威廉・林賽，〈我用碳 14 測年法確認「成吉思汗邊牆」修建年代，測試結果讓我又驚又喜〉

我在谷歌地球上找到的第一個障塞 nw001g（蒙、俄調查報告稱之爲諾彥縣的阿拉嘎城址）在全線最西端，大致呈正方形，四周牆體保存十分完好，但四面牆長度並不完全相同。據蒙、俄學者實測，西北方向城牆長約 78 公尺，東南方向約 87 公尺，東西方向兩面牆各約 90 公尺。[23] 土牆厚約 5 公尺，障塞僅有一門在東南方向牆體的中央，門洞約寬 6 公尺。城牆外四周有清晰可見寬約 10 公尺的壕溝。[24] 這種城壕常見於沿線其他漢代障塞，例如 nw002g。但似乎又不是每一座都如此，有些完全不見壕溝痕跡。這很可能是因爲原本的城壕已被兩千多年來的流沙所淹沒。

障塞另一特點爲牆體四角有向外凸出的角臺。這種角臺，以 nw001g 爲例，直徑約 9 公尺。角臺較一般牆體厚且高，百興圖城址的角臺殘高達 2 公尺。這種角臺幾乎爲南北線兩道外長城類似大小的障塞所共有，也見於漢代居延地區烽隧線，例如 A8、A35。二〇一八年秋我曾考察磴口縣沙金套海蘇木哈日戈那（哈隆格乃）山口西側漢代的雞鹿塞，這裡出土過和窳渾故城所見相同的漢代繩紋瓦及繩紋磚（圖 21），[25] 雞鹿塞的正方塞形和四牆角臺在形制上和 nw001g 幾乎一樣。現在能看到雞鹿塞的角臺經過修復（圖 22.1-22.2），原本遺址狀態見於早年調查時所攝照片和所繪的平面圖（圖 22.3-22.4）。[26]



圖 21：窳渾故城內農民堆積於屋舍後的繩紋漢磚（2018.10.29 作者攝）

[23] 本文附表二長寬數據是利用谷歌地球的量尺得出，非實測，僅供參考。今後應以實測數據爲準。本文測量的方形障塞如果方向不是正北正南，一律先測西北至東南的邊牆中央，再量東北至西南的邊牆中央，前者記錄爲東西長度，後者爲南北寬度。下同，不另注明。以 nw001g 爲例，我測量所取位置不同，但結果和蒙、俄學者實測者實際相差極微。

[24] 前引蒙、俄調查報告頁 103 謂壕溝寬約 5 公尺。我從谷歌地球看，實更寬，達 10 公尺左右，不知何故。

[25] 侯仁之，〈烏蘭布合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烏蘭布合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歷史地理研究——侯仁之自選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364, 404-407。

[26] 但也有學者如張海斌認爲布都毛德（道）溝的古城才是雞鹿塞，參張海斌，〈高闕、雞鹿塞及相關問題的再考察〉，《內蒙古文物考古》2000.1：23-28。唯高村武幸同意何清谷等人之說，認爲達巴圖音蘇木的那仁烏爾博（那仁烏布爾嘎查）遺跡（或稱達巴圖古城）才是高闕塞，哈日戈那（哈隆格乃）山口西側的爲雞鹿塞，布都毛德（道）溝的古城爲何？現階段還無法妥當比定。參高村武幸、廣瀨薰雄、渡邊英幸合編，《周緣領域からみた秦漢帝國 2》（東京：六一書房，2019），「附錄：遺跡考証の記錄」，頁 344-349。前引魏堅，《陰山滄桑》，頁 52-63 也主張達巴圖古城才是高闕塞。



圖 22.1：谷歌地球 2017 年影像



圖 22.2：雞鹿塞空拍照片
（2018.10.28 任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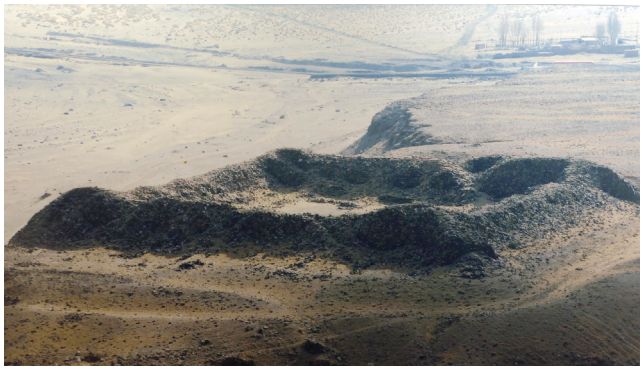


圖 22.3：整修前的雞鹿塞，邊長 68.5 公尺
（2018.10.28 作者攝於磴口縣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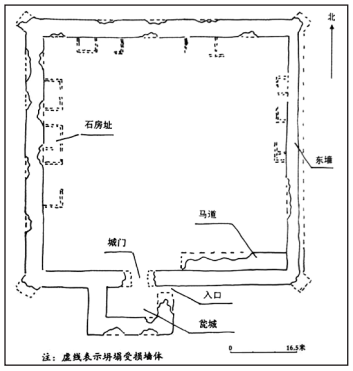


圖 22.4：雞鹿塞址平面圖
（2018.10.28 作者攝於磴口縣博物館）

此外，必須一提的是雞鹿塞南側門外側所修的 L 形牆幾乎是漢世障塞的共同特徵。[27] 本文所涉內外蒙古北線長城的二十餘座障塞僅有 nw002g 東牆中央外側還可略見 L 形牆的痕跡，nw022g 南側牆可見一部分（圖 23.1-23.2），其他可惜都只見門洞，門外部分幾乎全毀無痕。可是 L 形牆相當完整地保留在雞鹿塞南牆、居延烽隧例如破城子 A8（甲渠候官）等遺址（圖 24.1-24.2），也見於內蒙古外長城南線障塞（圖 25.1-10）。

單從障塞構築外形特徵看（方形、塞外有壕、城四角築角臺、L 形牆和塞門皆朝東、東南或南……），即可證明蒙古國南戈壁省這一道長城及障塞應爲漢世所修，修建時明顯依據幾乎一致的構築規範，其構築年代相去不遠，應在武帝太初三年

[27] 吳礽驤先生稱這種 L 形牆爲曲尺形曲壁，認爲即居延漢簡中所謂的「回門」。參吳礽驤，《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 127, 180。唯居延新簡 EPT57:108B 提到的回門出現在第十六隧，應指隧門。回門在出土簡中迄今僅一例可考，又迄今在漢隧遺址外似不曾見有曲尺形曲壁的設置，因此所謂回門是否和本文討論數十公尺見方以上較大型障塞的門稱謂相同，又回門眞正何指，暫難確定。本文仍稱爲 L 形牆。

（102 BC）至宣帝甘露二、三年（53、52 BC）的五十年期間。因爲自秦始皇以降，武、昭、宣帝之前和以後，沒有其他王朝統治者有如此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和動員的力量，又有必要在這一帶修築這般規模的軍事工程（詳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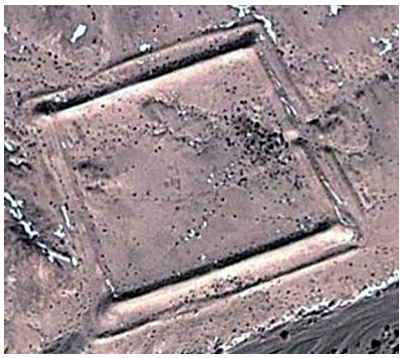


圖 23.1：障塞 nw002g



圖 23.2：障塞 nw022g



圖 24.1：居延甲渠候官遺址 破城子 A8
（任超 2017.10 空拍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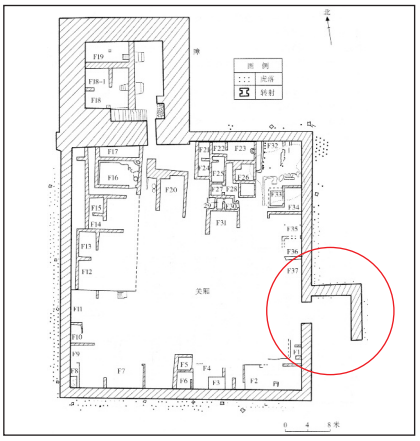


圖 24.2：破城子 A8 平面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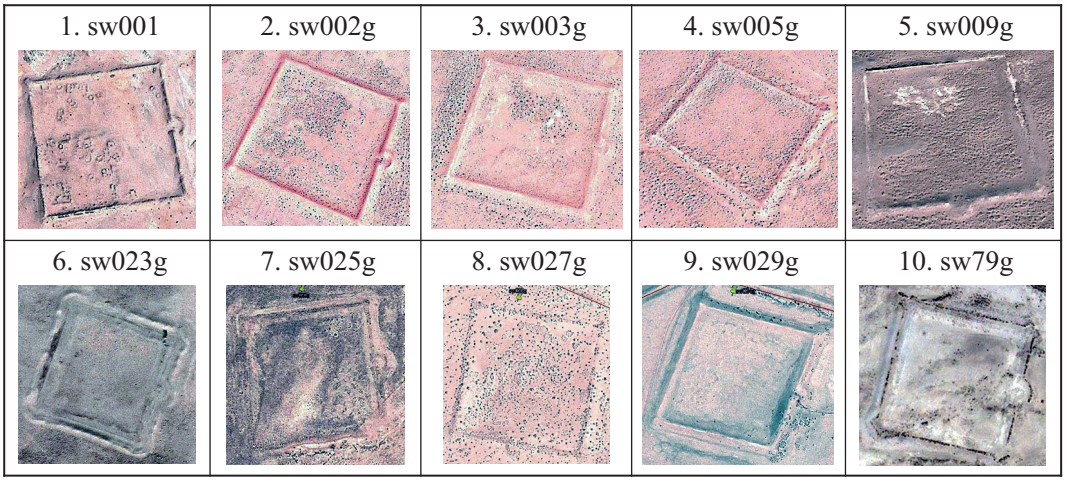


圖 25.1-10：內蒙外長城南線障塞的角臺和城門 L 形牆舉例

除了外形特徵，城和塞的構築材料因各地環境條件不一，不論土、石、紅柳、蘆葦、梭梭等植物莖榦，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不論漢或後世（有些明、清時仍沿用）幾乎都用同樣的材料，長期層層堆疊修補或加固同一個建築體。現在除非自上下和內外層層解剖取樣，實不易僅從表層或上層標本決定其建築年代。不知蒙、俄、日本學者是否曾剖開牆體斷面，取表、裡和上、下層不同部位的多件標本作碳十四的年代測定？[28]如果僅僅觀察長城或取障塞牆體的外層或上層物質當測定的標本，或僅觀察和採集地表的文物，必然得出較晚期的斷代。只有依據層位發掘，兼顧表裡，較合乎科學規範地取樣，並以多件樣本的年代比對，才能得到比較有說服力的斷代結果。

另外有一點必須考慮。以形制而言，漢代障塞和長城是不是可以和漢以後的區別開來呢？這是要確認長城和障塞屬不屬於漢代的先決條件之一。我粗淺的印象是漢代障塞的角臺結構和塞門外 L 形牆明顯較北魏以降的城障結構簡單。首先，漢代障塞迄今所見，不論城牆一邊有多長，外凸角臺僅見於四角。一個較明確的參照是青海海晏縣王莽時代西海郡郡城。此城地處偏僻，雖經後世利用，城圈保存較多原本面貌。城中曾出土極多漢代文物，包括有「始建國元年七月癸巳」紀年銘題的虎符石匱。[29]這可以說是迄今唯一時代較明確的漢代郡城遺址，其特點之一即在有角臺而無馬面（圖 26）。北魏以降的這一類城防工事爲強化牆體和防禦效果，不僅四角，沿城牆四周會依一定的間距修築多道外凸的馬面，可自城頭和兩側的馬面上，以弓矢等從三面攻擊城外的敵人。[30]



圖 26：青海海晏縣漢西海郡城遺跡（2017 年谷歌地球截圖）

[28] A. A. 科瓦列夫、Д. 額爾德涅巴特爾，〈蒙古國南戈壁省西夏長城與漢受降城有關問題的再探討〉，頁 101-110 雖曾列表碳十四測定取樣和年代，但沒有說明如何取樣，自牆體什麼部位取樣。威廉・林賽也曾採樣作碳十四測定，並附有採樣照片，林賽手持自牆體取出的梭梭枝，蹲在牆旁，照片附注「我在一段梭梭木成吉思汗邊牆前採樣」。從報導內容和採樣照片可知他是自牆頂和牆基採梭梭枝，皆取自表面。參威廉・林賽網上前引文〈我用碳 14 測年法確認「成吉思汗邊牆」修建年代，測試結果讓我又驚又喜〉。碳十四測年雖屬十一、二世紀，他仍認爲長城爲漢世所修，西夏曾修繕並利用。森谷一樹先生在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電郵中告知他們的一件標本是「從牆體裡面的木頭構造的最下層採集」，細節仍待公佈。

[29] 森谷一樹，〈衛星畫像が語ること—歷史學・考古學への應用にむけて—〉，收入前引高村武幸、廣瀨薰雄、渡邊英幸合編，《周緣領域からみた秦漢帝國 2》，頁 175-176。關於虎符石匱可參李零，〈說匱〉、〈王莽虎符石匱調查記〉兩文，收入氏著，《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 351-357。

[30] 馬面雖已見於新石器時代諸如陝西神木石峁、內蒙赤峰市三座店等夏家店下層距今四五千年的石城遺址，奇怪的是似乎全不見於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原地區。漢代城池雖有馬面可考，例如二〇一六年在遼寧阜新高林台發現的高林台城屬漢代燕北長城的一環，南城門兩側有凸出甚長的馬面，但這可能是戰國時代燕國受早期石城形制的影響，也可能是後期增建。馬面爲何不曾普遍應用在漢代都城、郡縣城、障塞和長城線上，其中緣故仍待解索。雖有學者認爲馬面和甕城到漢代已較常見，最少見於邊塞，並舉雞鹿塞爲證，這端看如何定義馬面和甕城。私意以爲不論雞鹿塞、其他漢世城障遺址或如和林格爾東漢墓壁畫中的寧城等形制都還簡單，僅城頭有雉堞或女牆，或城牆四角有外伸方或圓形的角臺，城門外另築 L 形牆，沒形成完整的「甕」，沒有魏

其次，漢代障塞在門外增築一道開口的Ｌ形牆，並沒有合口或多修一門（參破城子 A8，圖 24.1-24.2），但北魏以降爲強化城門的防禦力，將外凸的Ｌ形牆加長並折向，在城門外形成一方形或長方形的「甕」，在甕城正或側面有可開可閉的門，如此可自甕城之上攻擊衝入甕城中的敵人。從北魏以後，中國北方單體大城幾乎無不有馬面和甕城。甘肅高台魏晉前涼時期的駱駝城（圖 27.1-27.2）[31] 和陝西靖邊赫連勃勃所修大夏統萬城，即爲有方形甕城和多道馬面的例子（圖 28.1-28.3）。



圖 27.1：甘肅高台駱駝城



圖 27.2：駱駝城南牆角臺和中央甕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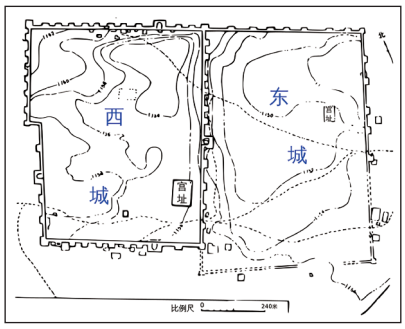


圖 28.1：統萬城平面圖（取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9F%E4%B8%87%E5%9F%8E%20）



圖 28.2：統萬城西南角的角樓和南牆馬面（2014.8.18 作者攝）

晉以後那樣的多道馬面和甕城。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一，〈官政一〉論馬面較早，也較詳。他曾舉赫連勃勃所築延州故豐林縣城「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爲例，說明城以馬面密爲上。什麼是馬面，似最好以沈括的描述以及離延州豐林不遠，如今尚存的大夏統萬城爲標準，以免定義不一而產生不必要的分歧。先秦城市形制的特色可參許宏，《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先秦城邑考古》（北京：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秦漢城邑可參徐龍國，《秦漢城邑考古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徐龍國研究北方長城沿線地帶的秦漢城邑，指出「內蒙古、陝西發現的城址中，帶有馬面的較多……不過帶馬面的城址都沒有發掘，而且又經後世修築沿用，所以馬面是否均爲秦漢所建，尚不能確定。」（頁 181）我贊同這一說法。徐書第五章有專節（頁 183-185）討論馬面問題，可參。又前引森谷一樹〈衛星畫像が語ること—歷史學・考古學への應用にむけて—〉一文頁 175-176 曾討論漢代古城是否有馬面問題，基本見解和徐龍國以及敝人不謀而合。

[31] 關於駱駝城實地調查可參高村武幸、廣瀨薰雄、渡邊英幸合編，《周緣領域からみた秦漢帝國 2》，「附錄：遺跡考証の記錄」，頁 245-249。



圖 28.3：2014 年正在發掘中的統萬城甕城，照片中黑灰牆面為曾被封堵的城門（2014.8.18 作者攝）

張文平先生指出灰騰梁長城的三道營古城曾是漢代定襄郡的東部都尉治所，現在遺址所見西城爲北魏所沿用，北魏泰常八年（423）增建東城，並加築了城牆四邊多道的馬面（圖 29.1-29.2）。[32] 張先生的這一剖析較原調查報告推進一步，很有啓發性。的確，不少漢塞爲後世如北魏或西夏利用，常增築了馬面和甕城。例如沿額濟納河被認爲是漢代肩水都尉府所在的障址 A35，既有角臺、馬面，障門外也有甕城（圖 30.1-30.4），障塞內曾出土大量西夏文的印板文書和西夏絲綢等物，因而一度被認爲是西夏之城，實際上是西夏沿用漢塞並另有增築。塞中曾出土多達 1500 枚漢代簡牘和其它遺物即爲明證。[33] 沿疏勒河漢塞安西段的小宛破城或小宛古城（或被稱爲破城子、140 號城），據李并成、岳邦湖和吳礽驤先生調查，從出土灰陶片、鐵器殘片等看，無疑是漢代障塞，或爲漢宜禾都尉府之昆侖障或美稷候官所在，北魏時加築了馬面，唐代仍在沿用（圖 3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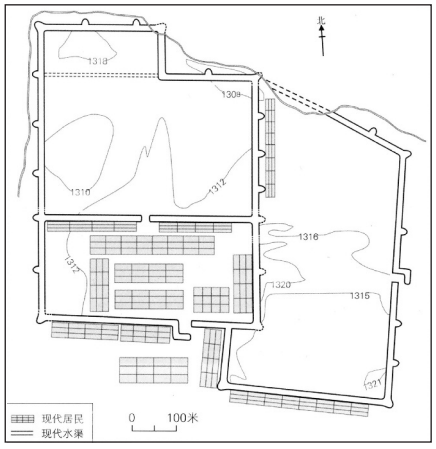


圖 29.1：三道營古城平面圖
（引自：《輝騰錫勒草原訪古》，頁 113，圖 4-103）



圖 29.2：谷歌地球上的三道營古城

[32] 張文平、袁永明主編，《輝騰錫勒草原訪古》，頁 113-117。張文平曾簡要敘述漢與北魏烽隧修築的差異，參張、袁前引書，頁 134-135。原調查報告參李興盛，〈內蒙古卓資縣三道營古城調查〉，《考古》1992.5：418-423。

[33] 參吳礽驤，《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頁 167-169；《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阿拉善卷》，頁 125-126。A35 是不是肩水都尉府所在，雖有學者質疑，但爲漢世所修，無人懷疑。

[34] 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地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頁 214；岳邦湖，《疏勒河流域漢代長城考察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57；前引吳礽驤，《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頁 105-106；高村武幸、廣瀨薰雄、渡邊英幸合編，《周縁領域からみた秦漢帝國 2》，「附錄：14 小宛破城子遺跡」（青木俊介執筆），頁 265-269。



圖 30.1：A35 谷歌地球截圖



圖 30.2：A35 空拍照片（馬怡贈）



圖 30.3：A35 西南角角臺（從西南朝東北拍攝）（2006.7.29 作者攝）



圖 30.4：A35 東門甕城（《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阿拉善卷》，彩圖 382）



圖 31：小宛破城

第三，《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北魏長城卷》指出北魏修長城工料都較爲草率，保存也欠佳。例如沿六鎮長城南、北線除見殘餘的牆體，另曾發現數十座長方或正方形，土築或石砌，長寬約 20 至 40 餘公尺，形制頗爲一致的戍堡。戍堡都沒有外凸角臺和 L 形牆。換言之，北魏將漢代長城線上障塞常見的外凸角臺和 L 形牆，強化成馬面和方形甕城，應用在上百和數百公尺見方單體的大城上（如北魏所修增隆昌古城出現馬面），[35] 卻沒有施用在長城線的戍堡上。再者，北魏六鎮長城線上的戍堡大小雖和漢代邊塞候官一級規模近似，卻不見烽火墩臺，也沒有以一定距離，間隔佈置不同規模等級障塞的現象。這些戍堡除了石砌者三例，在石堡四內角有

[35]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北魏長城卷》，頁 94。

可供居住的石砌屋舍遺存，其餘夯土所築的幾全不見屋舍痕跡，推測原應有可供戍卒居住，可移動的穹帳。[36] 以上這些差異可以幫助我們區分出漢代和北魏所修築的障塞和長城。

這些區別如果可以成立，則蒙古國南戈壁省的障塞和長城也應判定原爲漢代所修。因爲它們具有漢代而非漢代以後長城和障塞的諸般特色。不論蒙、俄學者在蒙古長城各障塞遺址，或蓋山林、陸思賢、魏堅在內蒙外長城南線障塞地表發現的西夏遺物，明顯都是西夏時期利用漢城和障塞時所遺留；地表下是否有較早期的文化層，目前除了幾處探溝，不曾發掘，認識還太有限，論定它們是西夏長城缺少說服力。說它們是成吉思汗長城、成吉思汗征邊牆或邊牆，當然就更不妥了。

從谷歌地球上可辨識的蒙古國長城障塞亭隧最少已有二十二處（包括森谷調查名爲 Ulaan Shiveet 的兩處），另有兩處可疑，一時無法確認。不論如何，原本當然不止此數。這二十二處間距不等，城址間距最短的是 nw006g、nw007g 至 nw008g 三處之間（圖 32），用谷歌量尺測量各相距 12、3 公里。由此可以推想，沿線原本每十餘公里即可假設有一座障塞。蒙古國境內長城東西之間距離，用谷歌地球粗略估量約 300 公里，蒙、俄學者估計不少於 315 公里，[37] 類似規模的障塞應可在三十座左右或以上。前述二十二處遺址包括：（1）六座很小，僅數公尺或 10 餘公尺見方的亭隧，（2）九座大小在邊長 100 公尺左右，和（3）一座規模特大，邊長達 200 多公尺，應屬另一等級的障塞（nw007g）。

令人納悶的是全線 300 多公里，規模較小的亭障或烽隧遺址目前找到的可以說極少。比較明確的是二〇〇五年 A. A. 科瓦列夫和蒙古學者曾在南戈壁省瑙木岡縣長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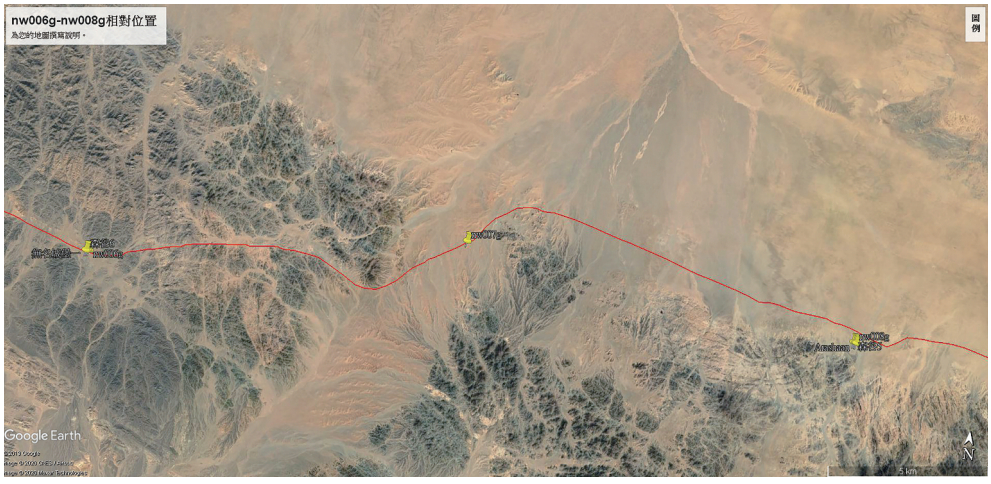


圖 32：nw006g-nw008g 相對位置及長城線，006g-007g 相距約 12,282 公尺，007g-008g 相距約 13,270 公尺

[36]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北魏長城卷》，頁 86-87。石砌戍堡見於六鎮長城北線，有三例。參《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北魏長城卷》，頁 51-52。

[37] A. A. 科瓦列夫、Д. 額爾德涅巴特爾，〈蒙古國南戈壁省西夏長城與漢受降城有關問題的再探討〉，頁 101。

北側山脈發現了「一線各式各樣的烽火臺」。可惜「一線」是指多少座？「各式各樣」又是什麼？是同時期或不同時期所修？沒有說明。此外，二〇〇九年 A. A. 科瓦列夫在同一縣發現 20x20 公尺，高 3 公尺石砌的瓦倫西沃烽火臺遺跡（圖 33）。[38] 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二年森谷一樹等人在蒙古國境內長城東端調查的 Ulaan Shiveet 遺址（本文編號森谷 1、森谷 2），森谷 2 烽臺邊長 19 公尺，高約 1.5-2 公尺（圖 34）。[39] 這樣大小的烽臺遺存無論土夯或石砌在內蒙外長城南線及陰山長城線上比比皆是，在居延、敦煌烽隧線也很多。烽臺只要不是遺留的外形太過殘損或被後世變造利用，從谷歌地球上應該可以看出。位置最靠北，作爲外長城北線的最外圍防線自西延伸入內蒙古後，向東延伸另有幾百公里，烽隧爲何很少？實地考察過的威廉・林賽曾注意到這一現象，並推測可能因爲建設沒有完成。[40] 是眞的很少，沒完成，還是調查仍然不夠？確實原因很值得進一步考察和研究。另外蒙、俄學者調查過的亭隧有的在長城以北，有的在長城以南，有的在長城南側達 22 公里（m008 或蒙、俄調查報告中的橢圓亭障，圖 35）。這些究竟是否爲同時期所修？是否屬漢代？爲何離長城如此遙遠？也有待確認和分析。



圖 33：瓦倫西沃烽火臺（引自：A. A. 科瓦列夫，〈是否有可能漢河西長城被當作西夏塞牆使用〉，圖四）



圖 34：Ulaan Shiveet 遺址（森谷 2）

[38] A. A. 科瓦列夫，〈是否有可能漢河西長城被當作西夏塞牆使用〉，頁 148。
[39] 〈森谷報告〉，頁 75。
[40] 參前引威廉・林賽著，經雷譯，〈走失的長城：在蒙古國尋找中國長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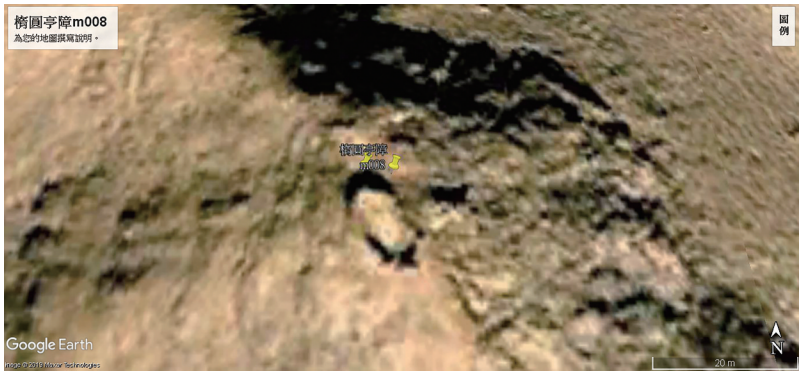


圖 35：橢圓亭障或 m008 烽火臺

四、2005、2007 年蒙、俄學者未調查的七座障塞

蒙、俄學者調查了蒙古國長城東、西兩端的若干長城和障塞，但沒有報導兩端之間的其它部分。西端調查止於哈拉西沃障塞（nw003g），本文以下約略從西向東，自 nw004g 開始介紹一下我從谷歌地球看到的七座障塞，並附帶一提另外兩座在疑似之間的遺址（nw011g、nw012g）。這七座中有五座，森谷一樹先生等曾於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二年實地調查，可以證明以谷歌地球「遙觀」所見非虛。下文將附錄森谷的調查記述，如有必要也會略作增補。並另外補充〈森谷報告〉沒提到的兩處遺址 nw007g 和 nw010g。

（1）nw004g（北緯 42˚20’22.51”，東經 103˚36’56.58”）呈正方形，東西邊長約 122 公尺，南北約 121 公尺（圖 36.1-36.2），海拔高度 1259 公尺，東北走向的長城在其北方約 536 公尺處折向東走，地勢漸升高至海拔 1297 公尺以上。nw004g 的城牆也和 nw001g 一樣，與長城不平行而有 35-45 的角度，也就是說幾乎以一個城角對著長城，一般又將城門開在朝東南或西南的牆中段。這應是基於防禦和安全考慮的一個選擇，也可能爲了避免風沙。nw004g 保存情況不佳，四方城牆大體仍在，牆外城壕約略可見，城門朝向則已不易分辨。

〈森谷報告〉頁 77 稱之爲無名城堡②：

> 該城堡西壁長 115 米、北壁長約 108 米。距離長城 530 米。有角臺，東開門。有城壕。這裡以前有胡楊林，因此附近的長城和城堡使用了很多的胡楊木。我們發掘了北壁，高 1.5 米，寬 2.6-2.7 米。依據 ^{14}C 得知該城壁的年代是 1047-1166 年（IAAA-120682）。
>
> （按：報告中沒有更多較詳細有關北壁碳十四如何取樣，如何定年的說明）



圖 36.1：nw004g 與長城相對位置



圖 36.2：nw004g

（2）nw005g（42˚20’44.33”，103˚44’16.97”）略呈正方形，四邊牆體仍存，東西邊長約 103 公尺（圖 37），南北約 118 公尺，東牆和南牆中央都似乎有缺斷，城門方向不明，海拔高度 1297 公尺。它和其他障塞不同處在於它幾乎和長城平行，相距僅 15、6 公尺。這種情況相當少見。

〈森谷報告〉頁 77 稱之爲 Kherem Khudag 遺址：

> （東經 103˚44’15”，北緯 42˚20’46”）從無名城堡①，城堡規模越往西邊越小。南北長 115 米，東西長 93 米，距離長城 20 米。有角臺，應該東邊開門。此遺址也沒有什麼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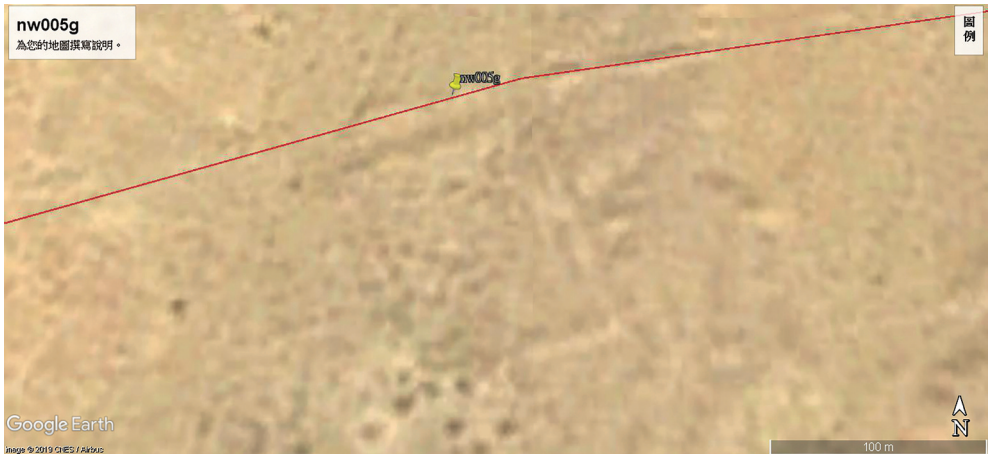


圖 37：nw005g

（3）nw006g（42˚28’17.06”，104˚01’54.00”）略呈正方形，四邊牆體保存較好，四角角臺幾乎完整，牆外有城壕，東西牆長約 136 公尺（圖 38.1-38.2），南北約 159 公尺，因西北南三牆不見缺口，城門應在東牆。障塞城角對著 125 公尺外的長城，有 35 至 45 度的角度。

nw006g 位於 nw005g 東北，相距約 30 公里。其間地勢不斷上升，nw006g 海拔 1582 公尺，較 nw005g 高出近 300 公尺。這一帶地形破碎複雜，長城線較曲折，有 8 公里左右在谷歌地球上完全看不出牆體痕跡。

〈森谷報告〉頁 77 稱之爲無名城堡①遺址：

> （東經 104˚1’51”，北緯 42˚28’19”）這座城堡沒有名稱。南北長 143 米，東西長 128 米，距離長城約 130 米。有角臺，南開門，也有城壕。採集有白釉、黑釉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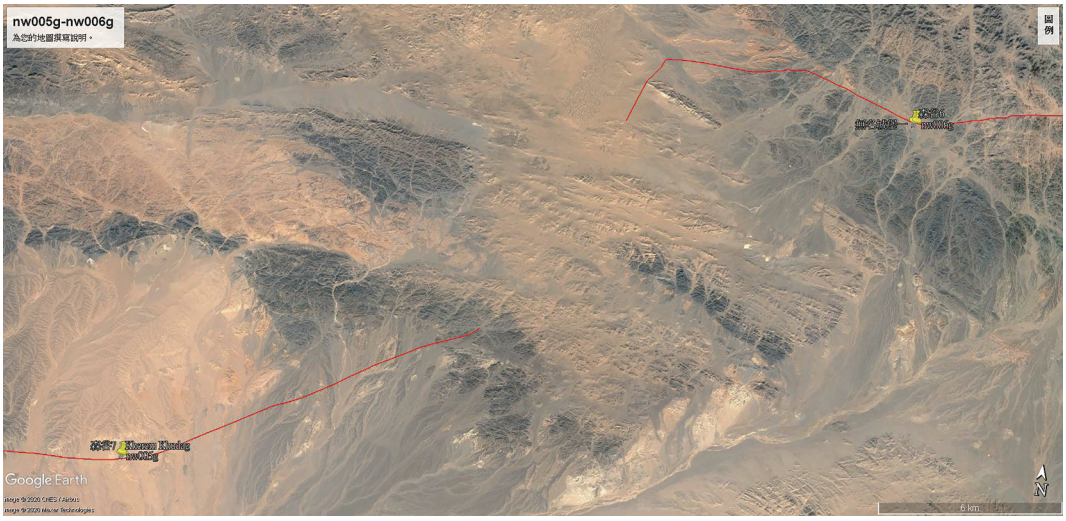


圖 38.1：nw005g、nw006g 相對位置，其間長城線有約 8 公里不明



圖 38.2：nw006g

（4）nw007g（42˚29’12.57”，104˚10’24.89”）略呈正方形，牆體保存甚差，西牆尚可見，南北牆僅剩少許痕跡，我追索時一度錯失它的存在。森谷一樹先生等人實地調查時也沒發現，可見如果自地表平視，地上痕跡應極不明顯。據殘痕估計，東西牆長約 278 公尺（圖 39.1-39.2），南北約 209 公尺，較前述各城都略大。城角以 45 度對著東北方相距約 85 公尺的長城。長城自 nw006g 一路向東，穿越海拔 1600 公尺左右的山區，轉向東北，至 12 公里外的 nw007g，高度降至約 1557 公尺。



圖 39.1：nw006g 與 nw007g 相對位置

（5）nw008g（42˚28’22.90”，104˚19’25.99”）略呈正方形，牆體保存極好，四牆和四角臺完整，牆體厚約 3、4 公尺，角臺長約 8 公尺。城門在東牆中央，城外壕溝寬 12 公尺，清晰可見。東西牆長約 135 公尺，南北寬約 118 公尺（圖 40.1-40.2）。障塞和長城之間略有角度，相距約 527 公尺。



圖 39.2：nw007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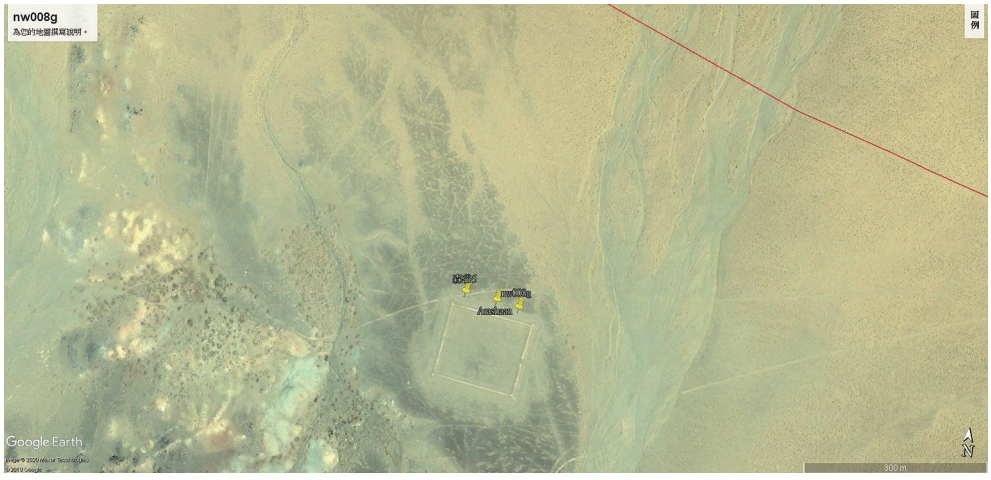


圖 40.1：nw008g 與長城相對位置



圖 40.2：nw008g

〈森谷報告〉頁 77 稱之爲 Arashaan 遺址：

> （東經 104˚19’24”，北緯 42˚28’25”）這座城堡南北長 120 米，東西長 137 米，距離長城約 500 米。有角臺，東開門，有城壕。與在內蒙古長城段的西夏城堡有共同的特點。採集有磁州窯系陶殘片。

據〈森谷報告〉可知，地表的確可以採集到不少後世的帶釉陶片，牆體的碳十四年代也屬十二世紀。但地表以下情況如何？牆體的年代測定又是如何取樣？仍有待進一步澄清。

自 nw008g 以東，蒙古國長城可以說開始進入偏東的段落。在偏東一段，蒙、俄學者曾調查了赫日門查干敖包和甘查毛頓胡圖克兩處城址，但我發現應還有另外三處，其中兩處較不明確，這裡仍稍稍一提，以便今後調查。又森谷一樹等學者另外發現兩處，他們的記述也附錄於後。

（6）nw009g（42˚18’55.28”，104˚59’52.35”）位於赫日門查干敖包東南約 21 公里，在長城南約 735 公尺，障塞和長城之間略有角度。nw009g 略呈正方形，牆體保存極好，四牆和四角臺大致完整，東北和西北兩牆略有殘失，牆體厚 5 至 8 公尺，角臺長約 13 公尺。城門在東南牆中央，城外壕溝不明，城內西北角似有房舍痕跡。東西牆長約 140 公尺，南北寬約 126 公尺（圖 41.1）。

〈森谷報告〉頁 77：

> Dersen Us 遺址（東經 104˚59’52”，北緯 42˚18’59”）這座城堡南北長 123 米，東西長 138 米，距離長城 80 米，城壁殘高 1 米，寬 2 米，有角臺，東開門。此遺址幾乎沒有什麼遺物。
>
> （按：谷歌地球測距，城堡距離長城應非 80 公尺，最少 730 公尺以上，疑〈森谷報告〉排印時 80 後或漏一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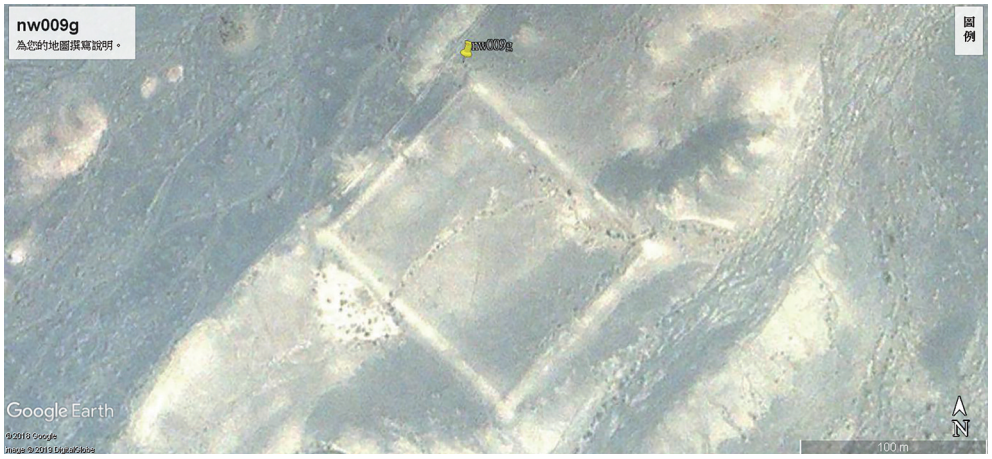


圖 41.1：nw009g

（7）nw010g（42˚17’37.28”，104˚59’21.60”）在 nw009g 南方約 2500 公尺，是一較小的遺址。nw010g 是極少數夾雜在近代房舍之間的遺址，距長城線又相當遙遠，極不易被發現（圖 41.2-41.4）。nw010g 呈正方形，四牆仍存，邊長約 17x20 公尺，門在東南牆中央，僅是一座烽隧遺址的大小。如果是烽隧，爲何在這麼遙遠的地方修烽隧？和 nw009g 障塞有無關係？是否同時所修？是否爲漢代所修？一連串的問題，都有待實地考查和發掘後才能解答。可能因爲距長城線較遠，周邊又間雜有近代建築，森谷一樹先生等人調查時是否沒注意到 nw010g 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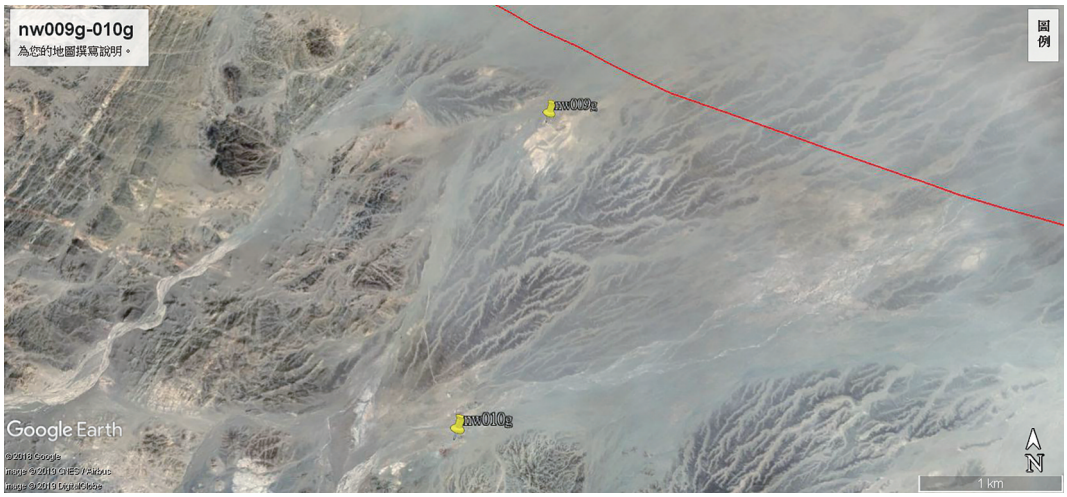


圖 41.2：nw009g 與 nw010g 相對位置



圖 41.3：nw010g 周邊房舍及其他建物

（8）nw011g（42˚15’51.74”，105˚12’50.51”）位於 nw009g 東南約 19 公里處，兩障塞間地勢平緩，海拔高度緩慢下降，長城線幾乎筆直地修在荒漠之上。但 nw011g 保存情況極差，如果不是從空中看，在長城南側不遠，略見方形障塞四角中的三角和約略的牆體痕跡，幾乎不敢相信它的存在（圖 42）。東南和西南兩側牆較可分辨，依

殘跡估計，東西牆長約 142 公尺，南北寬約 155 公尺。障塞和長城間約呈 45 度角，最近一角距長城約 40 公尺。這是我前面所說較可疑的兩處遺址中的一處。〈森谷報告〉未提到這一遺址。



圖 41.4：nw010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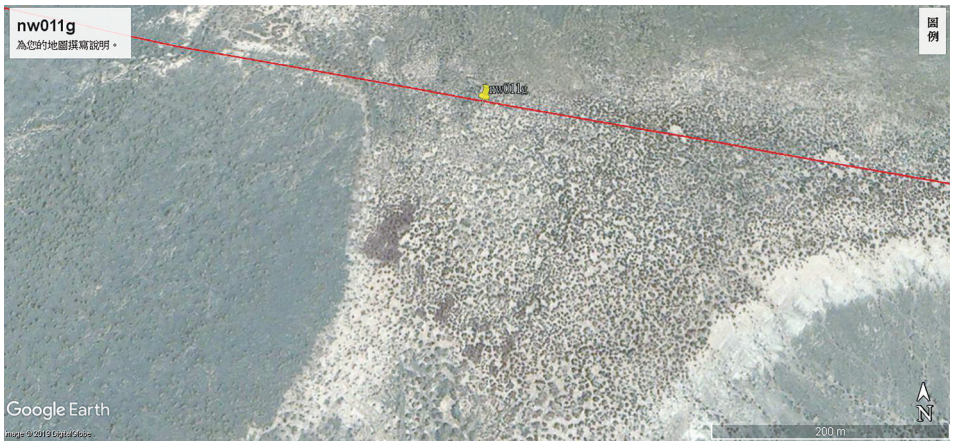


圖 42：nw011g



圖 43：nw012g

（9）nw012g（42°12’40.40”，105°37’28.02”）在甘查毛頓胡圖克城址以東約 24 公里的長城邊上。這是否爲障塞遺址，並無把握。從空中看，在長城南側不遠，有略呈方形，長寬約 76x73 公尺，已完全不見牆體，唯土色明顯較深，異於四周（圖 43）。這是什麼？僅能提出疑問，不敢確定它就是障塞。如果它是障塞，將是蒙古國境內唯一約略相當候官大小的長城障塞了。〈森谷報告〉未提，深願今後有人實地調查。

附錄：森谷 1、森谷 2

以下附錄森谷一樹等日本和蒙古學者共同調查距離中國內蒙古邊境最近的長城障塞和烽火臺 Ulaan Shiveet 遺址（圖 44.1-44.3）。〈森谷報告〉頁 75 有如下的記述：

> 這座城堡已經毀壞，可能看不太清楚。其位置距離中國國境約 3 千米。該城堡呈方形，南北長 144 米，東西長 142 米。西南山上有一座用石頭壘積而成的烽火臺（東經 105°44’45”，北緯 41°58’37”），呈方形，邊長 19 米，高約 1.5-2 米。如果從衛星圖片上看不出這裡是否有城堡的話，那麼即使去現場也不會清楚。因其被嚴重毀壞，所以門口的位置不明。遺物不多。從衛星照片上能夠看見的在城堡南邊的線條是耕地的痕跡。利用從山上流下來的水澆灌（圖一，本文略）。長城（東經 105°49’11”，北緯 42°01’43”）距此城堡 8 千米，稍遠。高僅 50 釐米，易被忽略。目前本地居民認爲這是成吉思汗攻擊西夏時建的道路（圖二，本文略）。

確實如森谷先生所說：「如果從衛星圖片上看不出這裡是否有城堡的話，那麼即使去現場也不會清楚。」前述 nw007g、nw011g 和 nw012g 都是例證。有些遺跡從地表平面看，很難辨識，衛星可見的，現場也不一定能看見。我相信今後考察如果能使用谷歌地球作大區域搜索，配合無人機（drone）作低空較清晰和較小範圍的觀測，應比單用谷歌地球等衛星圖片或現場以肉眼觀察更容易看清楚，更周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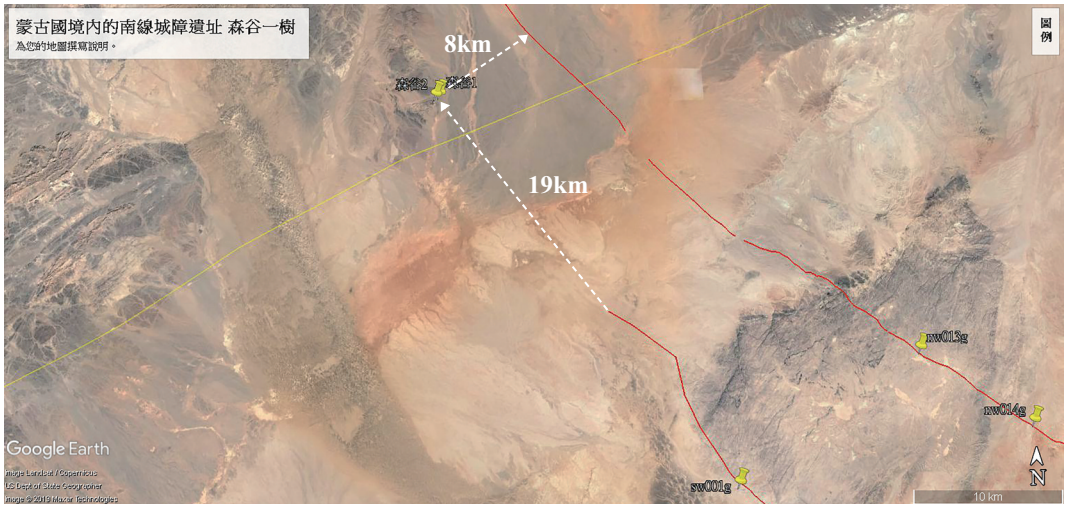


圖 44.1：森谷 1-2 遺址（Ulaan Shiveet）和外長城南北線相對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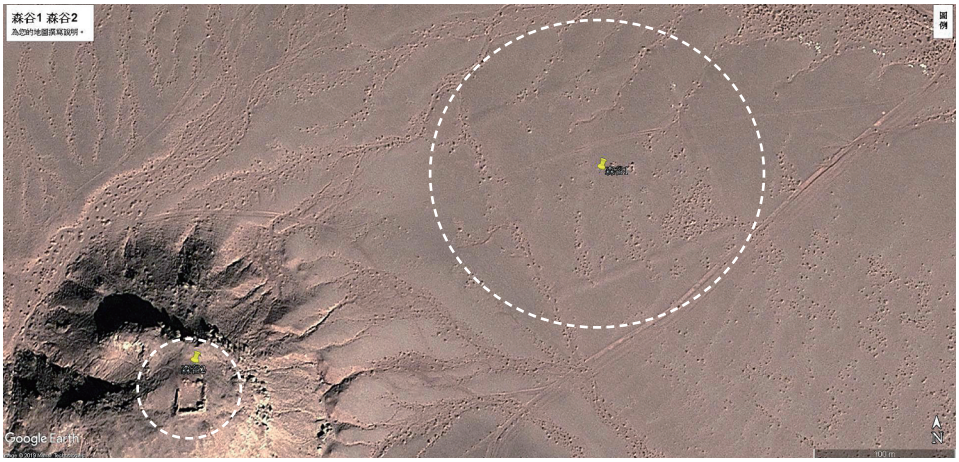


圖 44.2：森谷 1　森谷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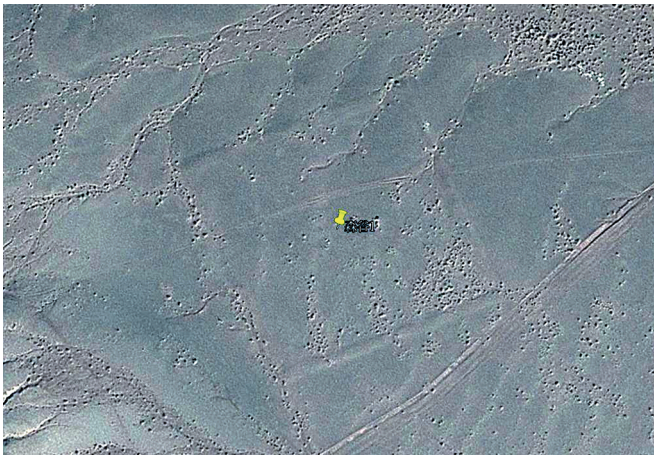


圖 44.3：森谷 1

唐曉峰先生主張外長城南線曾伸入今蒙古國一小段，雖然今天在谷歌地球上全無蹤影可尋。可是從森谷 1 和森谷 2 遺址所在的位置估計（距北線長城遠達 8 公里，卻在南線長城向西北延伸線上的 19 公里處），它們很可能是在南線長城的延長線上，原本即爲外長城南線的障隧（參圖 44.1）。果如此，南線應曾伸入今蒙古國邊界的不遠處。但伸入多遠？在何處終止？仍不清楚，有待調查。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即蒙、俄學者調查蒙古國長城西端時曾在長城線南北兩側距離稍遠，地勢較高的山坡上發現 10 餘公尺至 20 公尺見方的烽火臺，烽火臺並沒有修築在障塞內。森谷 1 和森谷 2 遺址的情形正是如此，這和蓋山林、陸思賢先生調查南線西端所見情形也相同。可見外長城南北線最少有某些段落依據的修築規範，應是一致的。

利用谷歌地球「遙觀」蒙古長城，所見到的眞是長城嗎？其實我一直沒有十足把握。幸好〈森谷報告〉頁 75、78 提到兩處長城的經緯度（東經 104° 46’54”，北緯 42° 23’30”、東經 105° 49’11”，北緯 42° 01’43”），剛好都和我遙觀所見的長城線符合，證明看到的牆體確實是長城，令我感覺踏實了不少。

五、蒙古國長城和居延邊塞防線是否相連？

以前研究居延邊塞，始終感到困惑：爲什麼漢代要沿南北向的弱水（黑水、額濟納河）修築防線？自戰國、秦以來爲對抗草原游牧民族，沿陰山修長城，到漢代開河西，沿疏勒河佈置障塞列隧，出敦煌，深入今天新疆南北路，[41] 防線基本上爲東西向，南北向的額濟納河防線如何抵禦自北方而來的匈奴或其他游牧民族？以前中國學者研究居延等邊塞簡牘的很多，卻很少談論這個問題。一般多視深入荒漠的居延爲漢代邊防的前哨或橋頭堡，修建南北縱向烽隧，以便即早偵知並傳遞敵情，作好防備，或者說爲了保衛河西這一通往西域的道路。[42] 但這樣並不能很好地解釋爲何在弱水以東，居延澤以南又有大片的屯田。屯田須要開闢土地，修渠灌溉，須要較多的人力和較長期的定居經營。漢代曾遷徙大量平民或罪犯及家屬，希望他們落戶邊陲，「占著所在」。居延漢簡即存在「徙民」和「新占民」的紀錄（168.12、EPT68:35、EPT68:47）。可見漢武等帝並不僅僅視居延爲偵查和傳送敵情的前哨，而以長期佔有爲終極目的。這是爲什麼昭帝時賢良文學議鹽鐵，大力抨擊武帝耗竭民力，遠徭久役，佔據不可耕的苦寒之地。[43]

的確，這一地帶絕大部分不可耕。爲什麼要長期佔有？十幾年前日本學者來村多加史指出漢武帝的戰略可能是藉著連結外長城和居延防線，以切斷北方匈奴在寧夏自治區以西廣大沙漠地帶的活動。隨著漢帝國北疆的擴大，長城線也不斷延伸。[44] 從戰略上說，除了開疆拓土，延長國防線，我感覺似乎也須要考慮控制水資源的重要性。

東西向的外長城如果和南北向的居延防線在居延澤以北連成一氣，即可將居延澤和居延屯田區完全包圍在防線內，一則佔有額濟納河和居延澤從事農墾和運輸，二則也可切斷草原牧民的一大水源。[45] 在水資源匱乏的地區，水的爭奪和控制具有極重要

[4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42]《史記・大宛傳》早有爲伐大宛「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的說法，今人多承而爲之說。這一類看法可參例如 Michael Loewe, *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48-52. 又可參本文注 46 引吳初驤先生之說。

[43] 參《鹽鐵論》〈輕重〉、〈廣地〉、〈備胡〉等篇。

[44] 來村多加史，《萬里の長城攻防三千年史》（東京：講談社，2003），頁 99-102。來村已注意到蓋山林和陸思賢的長城調查，也同意外長城和居延邊塞可能連線，雖然沒有絕對明證。參其書頁 100-101「漢代萬里長城圖」。

[45] 居延古綠洲地帶開渠灌溉主要引今額濟納河支流木納高勒河的水，但作爲額濟納河尾閭的古居延澤沿岸自細石器時代即有人定居，岸邊沉積淤沙中曾發現大量淡水螺碎片，碳十四測定年代屬 2976 ± 66 年。可見居延澤的水本不像今天弱鹼或鹼化而不利使用。李并成先生據朱震達、劉恕、景愛和他自己的調查研究，指出古居延澤地區沙漠鹽鹼化，主要在漢末魏晉以後，到明代初年發生斷流乾涸。詳見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時期沙漠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 199-209。換言之，在西漢中期至東漢初，額濟納河和古居延澤一直都是可利用的水源，雖然從漢簡中已見殄北塞一帶有「除沙」的記錄，證明沙化已經成爲問題。除沙問題可參森谷一樹，〈居延綠洲的遺迹分布和額濟納河——展望漢代居延綠洲的歷史性復原〉，收入井上充幸、加藤雄三、森谷一樹編，烏云格日勒譯，《黑水城兩千年歷史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頁 30-31。

的戰略意義。這從兩個小故事可見一斑。《漢書・衛青霍去病傳》謂「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所謂知善水草處，關鍵是水；沒有水，就沒有草。在這一帶行軍作戰，是否「知水草」所在，攸關生死。又《漢書・匈奴傳》謂浞野侯趙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單于發兵擊之，浞野侯退還，離受降城僅四百里，遭匈奴八萬騎圍困，「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軍遂沒於匈奴」。水在草原和荒漠之中無疑是一切生命的保障。武帝必然清楚，爲了邊塞駐軍能夠生存，也爲了彌補防線間隙，鞏固河西通西域之路，加強保障長城南線，拉大防禦縱深等等戰略需要，才不顧沉重的負擔，令路博德和徐自爲分頭修築居延塞和居延以東幾百公里長城的龐大工程。[46]

然而防線是否曾連成一氣？兩道長城是否眞的同步修築或有先後？何時完成或不曾完工？仍多不明。例如研究過古居延澤殘跡的景愛指出「古代居延澤的位置其北端約在北緯 42 度左右，其南端約在北緯 41 度 40 分左右，其東端約在東經 102 度左右，其西端約在東經 101 度 20 分左右。」[47] 又指出貝格曼標記的漢代亭障遺址 A10、A11 都在居延澤北部的京斯圖山上。京斯圖山以東的哈敦胡舒山上有漢代烽火臺和戍軍居住址。[48] 德國學者紀安諾二〇〇〇年調查過的遺址 T28、T28a（或 T29）也在 A10、A11 以東，居延澤北部，[49] 而 T28 可能就是哈敦胡舒山上的烽火臺和居住址（圖 45.1-45.4）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古居延澤北岸也調查到一些塞牆、障塞、烽



圖 45.1：哈敦胡舒烽火臺及烽臺下前方居住址（引自：景愛，《沙漠考古通論》，頁 202，附圖六一）



圖 45.2：烽火臺 T28
（紀安諾 2000 年夏所攝）



圖 45.3：T28 山下居住址
（紀安諾教授提供）

[46] 吳初驤先生在總結他對河西漢塞的認識，指出決定河西漢塞走向的主要因素時，曾特別提到維護河西驛道和取得水資源的重要，參前引氏著，《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頁 182-183。

[47] 景愛，《沙漠考古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頁 201-202 及附圖 60「衛星遙感圖象顯示的弱水與居延澤」，頁 206 圖 64「額濟納水系的變遷」。

[48] 景愛，《沙漠考古通論》，頁 202 及附圖 61「古居延澤北岸的哈敦胡舒烽火臺及居住址」。

[49] 這兩遺址經緯度數據見邢義田，〈全球定位系統（GPS）、3D 衛星影像導覽系統（Google Earth）與古代邊塞遺址研究〉，頁 238。唯紀安諾教授表示居住遺址是否是漢代留下的，不能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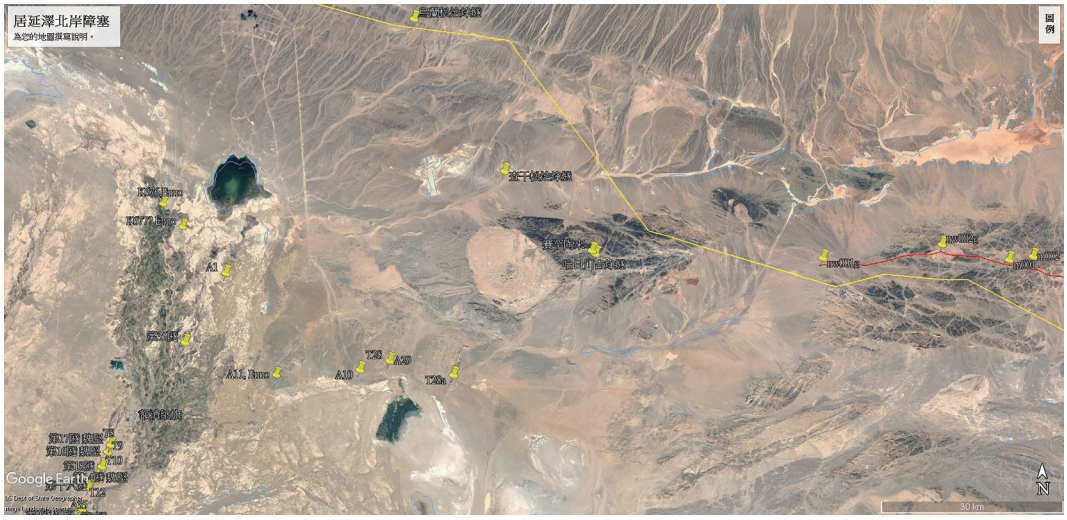


圖 45.4：古居延澤北岸障塞（K676、K677、A1、A11、A10、T28、T28a）相對位置圖

隧，甚至天田，如東起達來呼布鎮烏蘇榮貴嘎查東北約 32.9 公里，西止於烏蘇榮貴東北約 22.5 公里各長 8.3 公里的兩道塞牆和金斯圖淖爾天田。[50] 但是這些遺跡全無經緯度數據，無法在地圖上準確標出。它們和居延殄北候官所部各隧的相對關係如何？是否能和後者相連結？不可知。羅仕杰先生二〇〇三年刊佈他的考察成果，曾懷疑居延卅井候官（P9）出土簡中曾提到「海東」、「海東吏卒」（395.16、445.6，圖 46），會不會意味著在卅井候官以東有海東隧存在？[51] 羅仕杰先生當年考察時曾極目四望，希望看見烽隧或障塞的痕跡。雖無所獲，其說現在看來很值得重視。第一，據李并成先生調查報導：

> 哈敦胡舒一帶山嶺適在古居延澤的中間偏北，將古居延澤北部分隔成左右兩部分，作肺葉形。古居延澤的南部則合二爲一。考察中還見許多汽車到這裡來拉運湖底沉積的芒硝，以爲化工原料。**當地人士稱在芒硝產地之東發現漢代烽隧。這些烽隧的所在就是古居延澤東岸。**[52]

第二，從前述蒙古國境內長城和障塞以及內蒙古考古所在今額濟納河以東，巴丹吉林沙漠北端東緣已發現成列的烽隧遺址，所謂的筍布日和雅布賴列隧遺跡（參本文圖 9-10），可證居延澤以東存在障燧。漢代常稱流沙爲海，海東之「海」不論指古居延澤或居延澤以東某片流沙，海東因位於居延澤或海之東而得名，應無問題。這些烽隧遺址現在被《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阿拉善卷》歸入阿拉善盟的西夏長城遺跡。但《阿拉善卷》最後一章「結語」曾總結性地說道：

[50] 參前引《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阿拉善卷》，頁 88-90 及彩圖 314-315。
[51] 參羅仕杰，《漢代居延遺址調查與衛星遙測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頁 44。
[52] 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時期沙漠化研究》，頁 204。

> 阿拉善盟境内的西夏長城遺迹均分布于漢外長城北線以南一帶，遺迹以烽隧、障塞爲主，不見長城牆體。在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額濟納旗境内，都沿用了部分漢代障燧。[53]

換言之，古居延澤以東確實曾有漢代防禦建置，後來有些曾爲西夏所沿用。[54]但這些建置和居延澤以西的區域如何連繫？烽火是否相通，是否曾構成統一的防線？迄今除卅井候官出土的前述兩簡，只能暫時假想若干可能性（圖 47），沒有任何更明確的證據。



圖 46：居延簡 395.16（左）、445.6（右）及局部



圖 47：古居延澤北岸 漢長城烽隧線兩種假想示意圖

[53] 參前引《内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阿拉善卷》，頁 180 及頁 236-240，地圖三～五。
[54]《内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阿拉善卷》，頁 174-179。

因爲證據不足，有些問題一時還不容易得到解釋。例如宣帝本始元年至六年間（73-68 BC），居延和金關簡中存在這樣的記錄：

（1）本始元年九月庚子，虜可九十騎入甲渠止北隧，略得卒一人，盜取官三石弩一、稾矢十二、牛一、衣物去。城司馬〔宜〕昌將騎百八十二人從都尉追　（57.29）（圖 48.1）

（2）本始二年閏月乙亥，虜可五、六騎入卅井辟非□　（271.9）（圖 48.2）

（3）本始六年二月己乙卯府
匈奴虜入河泉□　（金關簡 73EJT1:156）

上半　下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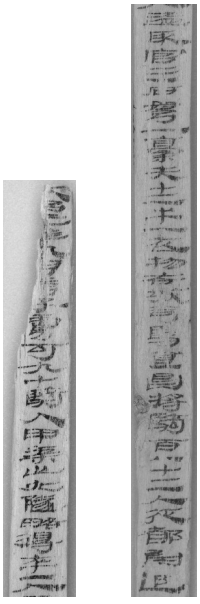


圖 48.1：居延簡 57.29



圖 48.2：居延簡 271.9

此外，有可能屬王莽或東漢建武時期，涉及從最北殄北塞到甲渠河北、河南塞到東南三十井塞的烽火品約提到：

●匈人奴晝入**殄北塞**舉二烽□煩烽一燔一積薪夜入燔一積薪舉堠上離合苣火毋絕至明甲渠**三十井塞**上和如品（E.P.F16:1）

●匈人奴晝甲渠**河北塞**舉二烽燔一積薪夜入燔一積薪舉堠上二苣火毋絕至明殄北三十井塞和如品（E.P.F16:2）

●匈奴人晝入甲渠**河南道上塞**舉二烽塢上大表一燔一積薪夜入燔一積薪舉堠上二苣火毋絕至明殄北三十井塞上和如品（E.P.F16:3）

●匈奴人晝入三十井降虜隧以東舉一烽燔一積薪夜入燔一積薪舉堠上一苣火毋絕至明甲渠殄北塞上和如品（E.P.F16:4）

●匈奴人晝入三十井候遠隧以東舉一烽燔一積薪堠上煙一夜入燔一積薪舉堠上一苣火毋絕至明甲渠殄北塞上和如品（E.P.F16:5）

●匈奴人渡三十井縣索關門外道上隧天田失亡舉一烽塢上大表一燔二積薪不失亡毋燔薪它如約（E.P.F16:6）

●匈奴人入三十井誠勢北隧縣索關以內舉烽燔薪如故三十井縣索關誠勢隧以南舉烽如故毋燔薪（E.P.F16:7）

●匈奴人入殄北塞舉三烽後復入甲渠部累舉旁河烽後復入三十井以內部累舉堠上直上烽□（E.P.F16:8）

按理說，如果匈奴遭武帝打擊，遠遁漠北，漠南無王庭，兩道外長城和居延邊塞又如果眞的在武帝時（死於 87 BC）曾連成一線，甲渠候官所屬的隧怎會在十幾年後的宣帝時遭受寇掠？卅井候官所轄各隧遠在屯田區東南，又有「海東吏卒」存在，「虜騎」從何而來？金關屬於肩水候官防區，在更南方，爲何會遭匈奴侵犯？烽火品約表明居延地區從北到南在王莽至東漢初仍時時可能遭遇侵襲，這是否意味著所謂的外長城到宣帝本始年間事實上尚未完成，並沒能和居延邊塞連成一氣？或者因王莽和匈奴關係惡化，陰山以北重回匈奴之手？或匈奴部落衆多，有些遠遁，有些歸附，另有些仍不時侵擾？情況究竟如何？仍然有待澄清。

以下僅就外長城是否曾完工以及是否曾與居延防線相接再說些想法。從《漢書・匈奴傳》看來，太初三年（102 BC）光祿勳徐自爲在五原塞北數百至上千里築障塞列亭至盧朐，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的活動應該都是在極度緊張不安的情勢下進行的。《匈奴傳》記述遣徐自爲築障塞列亭後，又說「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可見築城之地，漢軍尚無法穩固控制，須要特別另派軍隊保護築城者。在記述「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後，《匈奴傳》緊接著提到：

> 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

五原塞以北本是匈奴之地，漢武帝出塞築城修障，引起匈奴恐慌，大舉來攻。《匈奴傳》特別提到「行壞光祿所築亭障」；換言之，即便築好也可能遭破壞摧毀。接著幾年，漢、匈之間爭戰不斷，而且常是大規模的出塞遠征，直到武帝死前一年，即後元元年（88 BC）貳師將軍李廣利慘敗於速邪烏燕然山，投降匈奴，「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爲止。在這種情況下，人力物力必然十分吃緊，即

使一邊出征，一邊築障塞亭隧，進展和施工品質恐怕都難如太平之時。[55] 昭帝即位，漢、匈仍時和時戰，從五原到張掖都不時遭到匈奴入侵。例如昭帝元鳳三年（78 BC）「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漢書・匈奴傳》）從匈奴「騎入五原」、「南旁塞獵」和「行攻塞外亭障」不難想像，所謂的外長城即便已經修築，顯然會遭受攻擊，甚至破壞。因爲外長城一直沒能眞正鞏固，沿線邊郡的北界並未隨之北推，昭、宣之時，邊郡北界多半仍在陽山長城一線。[56] 譚其驤《地圖集》將緣邊郡界畫在陽山一線有其道理。《匈奴傳》接著說「是時漢邊郡燧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這裡所謂的「邊郡燧火候望精明」應是指原本沿陽山的邊郡界線而不是沿外長城的障塞烽隧。所謂「希復犯塞」，不完全正確。昭帝時不但匈奴入侵，烏桓也不時來犯。直到宣帝神爵二年（60 BC），後將軍趙充國還須「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此後匈奴陷入內亂，五單于爭立，甘露二年（52 BC）呼韓邪單于歸降，款五原塞，邊塞才有了暫時的和平。

從太初三年（102 BC）到甘露二年（52 BC）剛好五十年。我猜想外長城南北兩道，總長千餘公里，或土或石，工程浩大，應陸續修築於這五十年中，而非完成於片刻或完成於武帝時期。曾調查內蒙古長城的李逸友先生早已指出外長城北線「未完工」。[57] 二〇〇七、二〇〇九年魏堅先生考察烏拉特後旗地區南北兩道長城後，提出以下重要的觀察及解釋：

> 但就現場觀測，這兩條長城構築的規模，都不足以作爲一道屏障，阻擋匈奴的騎兵，特別是北線長城的高度和寬度，都似乎不像是一個完工的軍事建築，倒

[55] 傳世文獻中沒有漢代修長城動用多少人力物力的數據資料，但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尚書高閭上表請在六鎮之北修長城以禦蠕蠕時說「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魏書・高閭傳》）高閭爲鼓吹修長城，不免低估了所須的時日和人力。「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也就是說役男一人一個月可以修城約三步之長，僅是針對修城人力而言。其他擔任轉輸糧草物資的人力應估計在外，動員人力地區距徭役地點的遠近也顯然不在高閭的考慮之內。「十萬人一月必就」之詞有誇張之嫌。王子今先生曾據傳世文獻和秦簡等估算秦修直道和驪山陵等土木工程之土方工程量和用人數字，得出秦始皇陵復土用工人數超過 70 萬的記載基本可信，以工程量和工期計，修直道「也應有數十萬施工者參與修築」。這個估計據《九章算數・商功》，包括挖土、夯土、運輸土方，但不包括開採石料、運石、砌石和饋糧等工作的人數。其詳請參王子今，《秦直道——秦始皇直道考察與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頁 66-85。又俄國學者安德列・隆可夫（Andrei V. Lunkov）等分析蒙、俄境內的成吉思汗長城，估計造長城這樣的土牆 1 公尺最少須 10 立方公尺的泥土，746 公里長城須 7,460,000 立方公尺泥土。一人一天依一般體力，用現代工具可搬運泥土 7-8 立方公尺，746 公里長城須 932,500 人／天次的勞動力（man-days of labor），數十年（several decades）才能完成。如果要在較短時間內完成，則須動員較多人力。參 Andrei V. Lunkov, Artur V. Kharinskii, Nikolai N. Kradin, Evgenii V. Kovychev, "The Frontier Fortification of the Liao Empire in Eastern Transbaikalia," *The Silk Road* 9 (2011): 115. 這一估計是以使用現代工具爲前提，僅及土方，未計其他。在內外蒙古這樣的地方因爲可動員的勞動力、糧食、天候、交通運輸、工具和物料生產等等因素，十一、二世紀時的工期必然遠遠超過以上的估計。

[56] 關於陽山長城請參辛德勇，〈陰山高闕與陽山高闕辨析——並論秦始皇萬里長城西段走向以及長城之起源諸問題〉，《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

[57] 李逸友，〈中國北方長城考述〉，頁 25。

> 像是在一個統一的尺度要求下完成的「第一期工程」。而實際上卻沒有再做後續的建築……此地乃無草缺水的荒涼之地，又皆築長城之材料匱乏，再加此地遠離糧食產區，糧米供應自然十分困難，故而僅僅就地取材，修築了兩條低矮的牆體，基本上沒有起到眞正軍事防禦的作用。因此，這兩條長城應當是沒有完工即已放棄的軍事工程。[58]

李逸友、魏堅和威廉・林賽的認識看來應屬可信。正因爲修築上因陋就簡，又未能完成，防禦功能無法充分發揮，昭、宣時期才不時遭到匈奴的侵擾。誠如魏堅所說，南北線尤其是北線高度、寬度都不足以構成有效防禦。今天見到的南北線長城乃兩千多年中遭自然和人爲不斷破壞後的景況。唐曉峰曾提到不少長城因風雨侵蝕，變得低矮，甚至成爲往來大漠，「冬不積雪，夏不積水」的道路。[59] 尤有甚者，戈壁荒漠建材極度缺乏，魏堅在調查長城北線巴音努如段時，曾在附近山坡發現多處採石場，其堆積的片石和砌築長城所用的片石「完全一致」，[60] 可見滿是礫石的戈壁，卻不一定隨處有可用的石材，採石須要到特定的地點（圖 49）。蒙古地區的民族自不可知的遠古即喜以石塊或立石圍繞在墓地四周，此俗最少從匈奴、突厥到蒙元沿續千餘年不絕。千餘年中，人們沿長城來往，長城和障塞的石材已不知有多少遭人移作它用。[61] 其結果是從殘跡恐怕難以估計原本的高度和寬度。長城和障塞原本應該較今天所見的更高、更寬；即便更高更寬，我也不得不承認會有因修築時人力和物力的窘迫而如魏堅所說「偷工減料」的可能。[62]



圖 49：北線長城巴音努如段採石場
（引自：《陰山滄桑》，圖 74）

無論如何，我仍想一問：南北兩道長城是同時或先後修築？我猜測外長城南線可能先修，爲保障南線不受侵擾，又北推數十公里築北線，並極力向西延伸，企圖與居

[58] 魏堅主編，《陰山滄桑》，頁 83。
[59] 唐曉峰，〈內蒙古西北部秦漢長城調查記〉，《文物》1977.5：19。
[60] 魏堅主編，《陰山滄桑》，頁 79。
[61] 可參塔拉、恩和圖布信主編，《蒙古國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遺存考古調查報告（2005-2006 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魏堅主編，《陰山滄桑》報導突厥墓葬部分，頁 104-113。此外，長城附近居民挪用長城石材於蓋屋的情形可參《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鄂爾多斯—烏海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 8。
[62] 魏堅主編，《陰山滄桑》，頁 77 明確提到北線形體規模小於南線，北線個別地段的牆體明顯變窄，也存在著「明顯偷工減料的現象。」

延邊塞相連接，以求建立全面性防線並獨佔水資源，以便屯田墾殖，減輕內郡供輸負擔，強化戰略優勢。奈何北線是在遭受匈奴侵擾破壞的威脅下施工，施工品質和完備程度可能都不如南線。魏堅曾明確提到北線不如南線，因此其遺跡保存的情況也比較差。[63] 最後可能因防線過遠過長，財力人力不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歸降，願爲漢之屏障，北線在不能固守和完成的情況下逐步放棄，和居延防線連接的企圖也沒有達成。

李逸友先生曾討論《匈奴傳》提到的「行壞光祿所築亭障」，並說：

> 這是匈奴人自南面北返時破壞，興築和守衛的士卒本是防北面之敵，但遭到自南面來犯之敵，便會措手不及而失敗，新築的外城也就被損壞。於是另築新的長城於其南側，有的只南移不足 3 公里，最遠的南撤約 40 公里，但將其西端與居延邊塞相連，構成了漢王朝北部邊境的新防線。由此看到，漢外長城南北線是同時所築之說是不可信的。[64]

我完全贊同李先生外長城南北線非同時所修的意見。但他推論的前提是認定南線和居延塞相連並構成新的防線。這情況發生在北線遭破壞之後，也就是說北線先修，接著才南撤改築南線。現在知道這個前提不能成立。又所謂匈奴人自南面北返，漢守軍措手不及，光祿所築亭障遂遭破壞，其實《匈奴傳》的「行壞」二字並未指明匈奴進攻的方向，是不是從南方進擊而破壞了光祿亭障，匈奴是否曾經和如何繞到南方，都缺乏證據。總之，其中眞相必待考古發掘，有遺址、遺物和簡牘文字證據後才能眞正知道。

六、蒙古國長城障塞有無可能出土簡牘？

據蒙、俄學者調查報告，他們曾在五處遺址（郝日木溫都爾、百興圖、哈拉西沃、赫日門查干敖包、甘查毛頓胡圖克城址）各挖掘一至三處 1x1 或 5x5 公尺的探溝，都沒有發現文化層。[65] 報告沒有說明他們是在上萬平方公尺的城中哪些部位挖掘探溝。據過去在居延和敦煌發掘漢塞可知，障塞內房址會有功能性分工（如敦煌懸泉

[63] 參前注 62，又參《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阿拉善卷》在第五章結語中曾提到：「經調查，漢外長城北線現存牆體或土築，或石砌，均保存較差，在地表多呈土壟、石壟狀……遠遠不及金界壕的保存狀況。」（頁 179-180）保存較差，原因可以很多，但與原本施工好壞應該也有關係。很期待今後內蒙古外長城的正式報告中能就南北線長城的施工和用料品質作一比較，可以幫助我們從不同角度，思考南北線修築的先後。

[64] 李逸友，〈中國北方長城考述〉，頁 25。

[65] A. A. 科瓦列夫、Д. 額爾德涅巴特爾，〈蒙古國南戈壁省西夏長城與漢受降城有關問題的再探討〉，頁 101-110。

置、居延甲渠候官破城子 A8、肩水金關），[66] 簡牘比較可能出土於某些特定區域的房址內，也經常出土於距離障塞外不遠，堆積廢棄物的灰坑。不知蒙、俄學者試掘了障內那些區域？是否曾試掘過障外？會不會錯失了發現簡牘或其他文物的機會？

蒙古國外長城線東西綿延 300 多公里，自然地理和天候環境並不一致。但相對來說，全線處於南戈壁省的沙漠荒原和戈壁，氣候較爲乾冷，有比較好的保存地下文物的條件。以人文環境來說，這些地區在歷史上除了西端居延一帶，北朝、唐、西夏、元代有間歇性的墾殖活動，[67] 全線人口一直極度稀少，至今沒有現代城市、道路等建設，也沒有大規模的工、礦業破壞。從谷歌地球上能見到的障塞周邊人爲活動痕跡極少。這不禁使我幻想長城沿線，在西夏文化層之下如有遺物，大部分應都還靜靜地等候著考古工作者的鋤頭。

如同中外許多學者所主張，漢世邊塞處理和保存簡牘文書和簿籍最低的單位是候官或部，絕大部分簡牘如本文附錄表一「額濟納河流域邊塞遺址出土簡牘表」所列，集中出土自候官或部的障塞遺址。額濟納河流域的候官或部遺址大小多在數十平方公尺左右，蒙古長城沿線障塞規模常達百餘公尺見方，應屬層級不低甚至較高的單位，似乎該有不少，甚或較多的簡牘蘊藏。儘管這些長城線上障塞的層級屬性不明，駐軍人數不可考；但依漢制，只要有駐軍，即不可能沒有往來的文書，有文書或簿籍即可能有簡牘遺存。

武帝時由路博德和徐自爲等所修築的障塞和長城最少沿用到宣、元帝時期，額濟納河流域的烽隧沿用到東漢明、章之世。今內外蒙的外長城北線可能沿用到宣帝甘露三年（51 BC）呼韓邪單于來朝，北歸「居幕南，保光祿城」（《漢書・宣帝紀》）爲止，爲期約五十年。光祿城，《漢書・匈奴傳》作光祿塞，應在外長城南線。所謂「保光祿城」應是由匈奴保光祿城或塞的外圍，成爲漢世文獻所說的「保塞蠻夷」（《史記・文帝本紀》、《漢書・匈奴傳》）。果如此，漢軍很可能從此自北線障塞南撤而讓匈奴進入，外長城北線出土甘露三年以後簡牘文書的機率應該較小。

外長城南線一直到西漢末王莽時期都在漢朝手中。據《漢書・匈奴傳》，宣帝地節二年時（68 BC）虛閭權渠單于立，不能爲寇，宣帝曾一度「罷外城，以休百姓」，奈何後來匈奴仍時時入侵而不能罷。元帝竟寧元年，以王昭君下嫁歸服的呼韓邪單

[66] 青木俊介，〈候官における簿籍の保存と廢棄—A8 遺址文書庫・事務區畫出土簡牘の狀況を手がかりに—〉，收入籾山明、佐藤信編，《文獻と遺物の境界——中國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的研究》（東京：六一書房，2011），頁 139-162。

[67] 關於居延一帶歷史上人爲活動的興衰，可參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時期沙漠化研究》，頁 32-39, 199-209；徐蘋芳，〈從居延到黑城（亦集乃）——中國西部開發中的歷史經驗〉，《中國歷史考古學論集》，頁 386-404。

于，呼韓邪願代漢保塞，朝中又議「罷外城，省亭隧」，因郎中侯應反對，元帝下詔「勿議罷邊塞事」。成帝綏和時（8-7 BC），烏珠留若鞮單于在給成帝的信中說「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可見武、昭、宣以來修築的外長城，最少到成帝末，南線仍在漢朝手中。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烏珠留若鞮單于給王莽的信中再度重申：「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兩信都不提文帝和武帝，反而強調孝宣和孝元以來的約束，很明顯一直到新莽始建國二年（10）因更改單于名號和更印爲章，和匈奴最後鬧翻之前，漢、匈都是以陽山以北的外長城爲界。如同前文所說，從武帝太初三年到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來朝，約有五十年是以外長城北線爲界，自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保光祿城」後到新莽始建國二年，約有近六十年的邊界應逐漸南移到了外長城南線。我強調「逐漸」，是因爲事關漢、匈雙方安全，不難推想這期間應該會有一個雙方建立互信，漸漸移入和移出的過程。不論外長城南或北線，只要漢朝曾駐軍，只要有百分、千分或萬分之一的簡牘文書存留，甚至僅一枚簡牘出土，都將是無價之寶。因爲這可以成爲蒙古外長城爲漢代所修，漢軍曾駐防最明確的證據。

有了經緯度數據，我相信有系統和較全面地定點發掘，結果應不會令人失望。因爲漢軍戍守南線較北線的時間長，達百餘年，這和居延邊塞活動頻繁的西漢中晚期到東漢初，在時間長短上不相上下，南線障塞亭隧設施又較密集和完善，出土簡牘文書的機率可能較高。可是北線長城長度幾爲南線的一倍，沿線較少受到後世再利用和開發的破壞，出土文物和簡牘的機會也應該不會太低。我樂觀期待今後蒙古長城沿線障塞的發掘。發掘後，從出土文書的時代先後即可證實或推翻本文的推測。如果一無漢世文物或簡牘出土，或者出土了其他時代的文書，也都有助於我們修正錯誤，進一步認識這兩道在荒漠中幾乎被遺忘的長城。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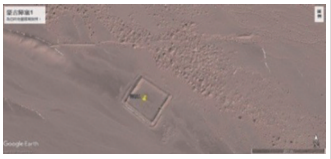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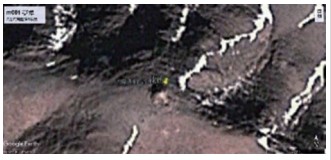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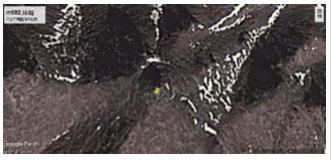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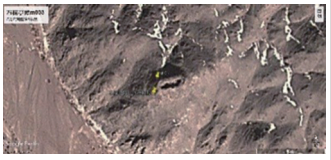
表一：額濟納河流域邊塞遺址出土簡牘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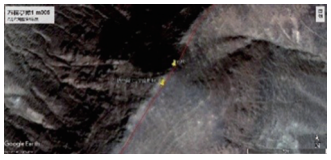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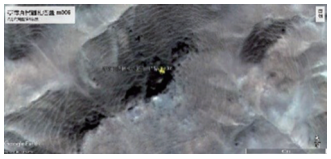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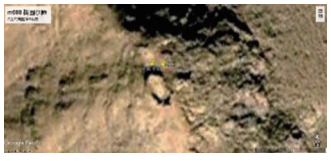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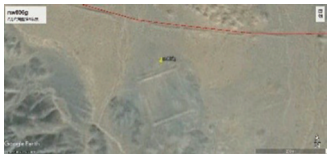
	遺址編號	遺址殘存規模	推定部隧名	簡數及相關物品	備　註
1	A1 宗間阿瑪	31x32 （公尺，下同）	殄北塞	貝格曼報告出土簡約 50 枚 封檢 4 件	出土於 A1 第二地點，《甲乙編》著錄 63 枚
2	A8 破城子	Fort 障 39x41	甲渠候官	1930：簡 5216 枚 毛筆 1 件，帛書 2 件 1974：簡 7000 餘枚	
3	P9 博羅松治	30x30 （遺址多數，僅計一最大處）	卅井候官	簡約 350 枚	
4	A22 布肯托尼	烽臺坍土圓墩 24x28 房址 3.3x1.8		第 1 地點簡 50 枚 第 2、4 地點若干	《甲乙編》據「標記冊」應有出土簡 83 枚
5	A32 金關	10x10 （遺址多數，僅計一最大處）		1930：簡 850 餘枚 1973：簡 10000 餘枚	1930 簡分別出土於五個地點
6	A33 地灣	22.5x22.5	肩水候官	簡 2000 餘枚 帛書 3 件 有字紙 1 件 殘筆 1 件	簡帛紙出土於數個地點
7	A35 大灣城	350x250	驛馬田官？ 肩水都尉府？	簡 1500 餘枚	簡出土於數個地點 吳礽驤推定爲肩水都尉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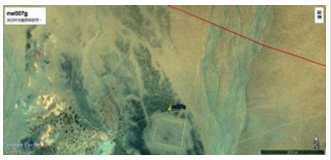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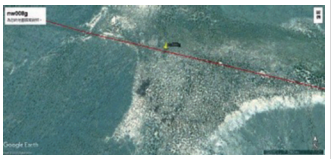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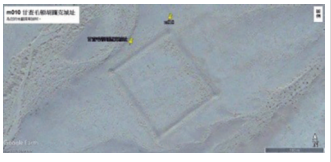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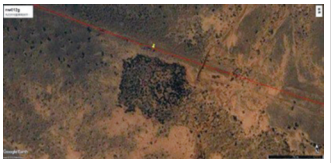
說明：據 Bo Sommarström,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the Edsen-gol region Inner Mongolia*；《居延漢簡甲乙編》（〈居延漢簡的出土地點與編號〉、〈額濟納河流域障隧述要〉）編製。A33 地灣出土另據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44 增補。

表二：蒙古國南戈壁省長城障塞亭隧遺址表

編號自西向東（nw 爲作者發現　m爲蒙俄學者發現　凡 nw 編號附中文地名者，爲作者與蒙俄學者重複發現）

編　號	遺址長寬 東西 x 南北 單位：公尺	北　緯	東　經	障塞與邊牆最近距離（公尺）	20190405/1218
					共計 22 處（另 2 處可疑）
01 nw001g 諾彥縣　阿拉嘎城址	83.21x90.75 牆厚 5 角臺直徑 9 東南牆門洞寬 6 城外壕寬 5	42˚ 10’19.34”	102˚ 25’04.10”	97.99	
02 nw002g 亦和浩特格爾城址	85.36x76.63 牆厚 5 角臺直徑 9 東牆門寬 6 城外壕寬 4.5	42˚ 11’25.68”	102˚ 39’14.55”	57.69	
03 m001 亭障	圓形 直徑 5	42˚ 10’03.27”	102˚ 47’12.01”	364.45	
04 m002 烽隧	石砌 直徑 4	42˚ 10’19.02”	102˚ 50’04.84”	808.49 長城北	
05 m003 石構亭障	略呈橢圓 25x16	42˚ 11’38.50”	102˚ 58’27.55”	3147.82 長城北	
06 m004 郝日木溫都爾城址	95x95 牆厚 6 牆高 1.5 角臺高 2.5 東南牆門寬 7 城外壕深 1 寬 5	42˚ 09’04.11”	103˚ 00’42.94”	2470.57	

07 m005 石構亭障 1	？調查報告未提	42° 10’37.70”	103° 01’48.00”	長城線上	
08 m006 百興圖札答蓋 亭障	4x3	42° 11’46.02”	103° 06’17.73”	413.08 居長城北	
09 m007 百興圖城址	87x100 牆厚 6 高 1.5 角臺高 2 東牆門寬 6 城外壕深 1 寬 7	42° 11’30.33”	103° 08’31.25”	859.40	
010 m008 橢圓亭障	7.4x13.6 牆高 3	42° 01’08.38”	103° 15’55.31”	23192.36	
011 nw003g 哈拉西沃城址	96x110 牆厚 7 高 1.5 角臺高 2.5 東牆門寬 10 城外壕深 1 寬 6	42° 14’13.02” （蒙俄調查報告經緯度數據誤與百興圖城址數據重複）	103° 17’19.62”	111.29	
012 nw004g	121.56x120.59	42° 20’22.51”	103° 36’56.58”	535.71	
013 nw005g	103.47x118.44	42° 20’44.33”	103° 44’16.97”	13.65	
014 nw006g	136.06x158.98	42° 28’17.06”	104° 01’54.00”	128.37	

015 nw007g	277.77x208.70	42° 29’12.57”	104° 10’24.89”	98.72	
016 nw008g	134.56x118.20	42° 28’22.90”	104° 19’25.99”	523.51	 
017 m009 郝日門查干敖包城址	115x145 牆厚 4 高 1 角臺高 2 直徑 8 東牆門寬 5 城外壕深 1 寬 3	42° 26’17.03”	104° 39’54.23”	459.38	
018 nw009g	140.42x125.85	42° 18’55.28”	104° 59’52.35”	733.04	
019 nw010g	16.60x19.76	42° 17’37.28”	104° 59’21.60”	3213.78	
020? nw011g	142.02x155.58	42° 15’51.74”	105° 12’50.51”	46.67	
021 m010 甘查毛頓胡圖克城址	111x117 牆厚 5 高 1 角臺高 2 直徑 8 東牆門寬 4 城外壕深 1 寬 4	42° 13’18.39”	105° 19’54.71”	2360.77	
022? nw012g	76.54x73.45	42° 12’40.40”	105° 37’28.02”	7.81	

023 森谷 1 Ulaan Shiveet	144x142	41° 58’42.73”	105° 44’57.21”	8000	
024 森谷 2 Ulaan Shiveet	19x19 高約 1.5-2	41° 58’37.64”	105° 44’45.36”	8300	

說明：表中照片截圖自谷歌地球，障塞長寬、牆厚、角臺直徑高度、門寬和壕溝深寬等數據，分別轉錄自 A. A. 科瓦列夫、Л. 額爾德涅巴特爾，〈蒙古國南戈壁省西夏長城與漢受降城有關問題的再探討〉，《內蒙古文物考古》2008.2：101-110；森谷一樹等，〈2011-2012 年蒙古國南戈壁省長城、城堡遺址調查報告〉，收入魏堅、呂學明主編，《東北亞古代聚落與城市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頁 75-80。